

詩史在「新我」與「故吾」之間： 論瞿蛻園《補書堂詩錄》

邱 怡 瑄^{*}

提 要

以校注李白和劉禹錫詩集馳名的瞿蛻園（原名瞿宣穎，1894-1973），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成就極高，卻備受學界冷落的詩家。其詩集《補書堂詩錄》具備多重版本，然散藏於中、港、臺各地。世所公認其作深具「詩史」價值，迄今卻尚無學者針對其詩藝，進行全面性的整理與深入論述。本文首先廓清《補書堂詩錄》複雜的版本問題，並通過「詩史」的理論觀照，思考瞿宣穎作品與其多重版本在詩歌及歷史兩方面的價值與意義。通過仔細考校詮讀《補書堂詩錄》在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各版本間的詩文差異，本文發現多處文字改動後，歷史觀點亦隨之改易的證據。從「新我」與「故吾」並存的文獻裡，本文推導出以下結論：《補書堂詩錄》的多重版本，並非僅是文獻校勘的問題。此書各版本反映著詩人反覆重寫、修訂文字的歷程與結果，這一現象即為「詩史」理論的本質，通過文學再現的歷史。詩人挪動典故，替換隱喻、反覆修改詩稿間，皆是其「自我」與「世界」不斷碰撞後的展演，亦是詩歌對記

本文於108.12.10收稿，109.09.16審查通過。

^{*}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DOI:10.6281/NTUCL.202009_(70).0003

憶、對歷史的反覆銘刻與自我定義。

關鍵詞：瞿宣穎、蛻園、《補書堂詩錄》、詩史、民國舊體文學

The Poetized History amid the “Present-self” and the “Previous-self”: On *Bushutang shilu* by Tui-yuan Qu

Chiu, Yi-Hsuan*

Abstract

Known for collating and annotating the poetry anthologies of Bai Li and Yu-xi Liu, Tui-yuan Qu (originally named Xuan-ying Qu, 1874-1973) was a poet of high achie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received surprisingly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nowadays. Widely recognized as having the value of “poetizing history,” his poetry anthology *Bushutang shilu* was published in multiple versions and respectively collected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However,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Qu’s mastery of poetry has been wanting to date. Therefore, this study first of all disentangles the complex issue concerning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Bushutang shilu*, and, by reference to the theory of “poetized history,” it cogitates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nthology, along with its multiple versions, in terms of poetry and history. After the meticulous,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versions published respectively in the 1940s, 1950s and 1960s, this study reveals several pieces of evidence on how the poet’s perspective of history changed with the revision in phraseology. From the literature in which the “present-self” and the “previous-self” coexist with each other, this study infers that the multiple versions of *Bushutang shilu* were not simply a matter of literature collation. Rather, they implied the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Qu’s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f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inued rewriting and revision, which embodied the essence of the theory of “poetized history.” In sum, the constant clashes between Qu’s “self” and the “world,” as well as his repeated inscription and self-definition of memory and history through poetry, have found vivid expression in his appropriation of classical stories, replacement of metaphors, and emendation to the manuscript.

Keywords: Xuan-ying Qu, Tui-yuan, *Bushutang shilu*, poetized history,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詩史在「新我」與「故吾」之間： 論瞿蛻園《補書堂詩錄》*

邱 怡 瑄

一、引言：《補書堂詩錄》的兩版序文 與其「詩史」評價之反思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李白集校注》與《劉禹錫集箋證》，作者皆為瞿蛻園（1894-1973），其原名瞿宣穎，字兌之。¹ 在目前已公開的文獻材料裡，

* 感謝二位匿名評審惠賜犀照之見；並感謝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等學界師友，協助我調閱善本、抄查資料。另本文撰寫期間，特別感謝曾守仁教授、陳煒舜教授、楊玉成教授及楊治宜教授曾惠示高見；廖棟樑教授及科技部人社中心的支持，亦使此研究不致中輟；劉威志教授對拙文則有批卻導窾，以琢以裁之功。筆者獲益於師友處匪淺，特識於此，以示不忘。

¹ 二書俱在文革前成稿，惟皆至文革結束後始能出版。《李白集校注》與朱金城合著，初版在1980年，《劉禹錫集箋證》則在1989年付印。然鄧小軍稱譽《李白集校注》對唐朝玄、肅間史事頗能發幽掘隱，將其與湯漢注陶、錢注杜詩、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諸書，並推為詩歌箋釋史上具典範意義之作。陳尚君亦指出瞿蛻園熟稔唐史，且對劉禹錫人際維度把握精準，故能箋出劉集中許多詩旨遙深之作。見鄧小軍：〈中國詩歌解釋史上的學術革命典範——湯漢注陶、《錢注杜詩》、《李白集校注》、《柳如是別傳》〉，收入安徽師範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編：《中國詩學研究》13輯（2017年8月），頁22-25、陳尚君：〈瞿蛻園解讀劉禹錫的人際維度——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評述〉，收入氏著：《唐詩求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525-544。

瞿氏詩集《補書堂詩錄》，至少存在兩版本序文。²序文撰者之一乃瞿氏世交、摯友兼大學同窗的鍾介民（1893-1964）。³此序現僅見抄錄於復旦大學古籍部度藏 1950 年代《補書堂詩錄》的紅格稿本內；⁴另一則由前清進士錢崇威（1870-1969）所作，冠於 1964 至 1965 年間於香港付梓之瞿氏七十歲手定詩稿《補書堂詩錄》卷前。⁵兩序作者無論資歷識見，乃至與瞿氏之師友交誼，

² 鍾序抄於不著頁數的復旦大學藏稿本內，錢序刊於 1965 年線裝油印本卷前。稿本稀見不易得，俾便討論故，文末附錄鍾序全文，文中括引則註腳從略，以避繁瑣。

³ 鍾介民原名純穎，字建閔，廣東蕉嶺人，為著名詩人黃遵憲（1848-1905）外孫。瞿宣穎 1928 年曾作〈寄唁鍾介民嶺南時予游遼吉〉詳述二人自幼及長交誼。1937 年北平淪陷前夕，瞿亦作〈河梁引贈別鍾寧遠之嶺南〉與之訣別（油印本改題為〈河梁引〉）。見瞿宣穎：《補書堂詩錄·甲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約 1965 年油印本），卷 2，頁 1a-2b、卷 3，頁 10a。鍾介民生平見黃玉釗主編：《梅州人物傳》（廣東：廣東省梅州志地方辦公室，1989 年），頁 291-292。

⁴ 復旦大學館藏《補書堂詩錄》謄錄於紅格稿紙上，每半葉 7 行 24 字。卷端首頁首行題「補書堂詩錄卷一」，次行題「瞿宣穎兌之父」。據田吉考證，復旦藏稿本是 1950 年代瞿宣穎交由滬上知交沈其光（1888-1970）、吳庠（1879-1961）等人批閱的謄清稿本。雙嘉室主人張軍又云該稿本有三冊（即卷三、卷四），為私人私藏。見〈瞿兌之《補書堂詩錄》版本經眼備考〉，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bf4520102xwtw.html（檢索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田吉說法則見田吉：《瞿宣穎年譜》（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2 年，吳格教授指導），頁 5。

⁵ 國家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俱有入藏此本。據古籍以卷首書名為據之著錄慣例，此書亦宜稱為《補書堂詩》。但本文一概稱作《補書堂詩錄》，係據以下考量：一是鍾、錢二序俱稱此書作《補書堂詩錄》；二是復旦藏稿本卷首書名即為《補書堂詩錄》，此又可與瞿宣穎 1961 年在上海出版的手定文存《補書堂文錄》相對；三是因 1940 年代，瞿氏發表在《中和》月刊上的個人舊詩專欄，名稱即為《補書堂詩錄》。關於此油印本的出版年代，據陳聲聰（1897-1987）云，乃王則潞（1907-1983）在香港所印。見陳聲聰：《兼于閣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81。但陳聲聰稱該香港印本僅收錄「己丑以前」（1949 年）詩作，則陳所見，或另有版本亦未可知。本文推論此書刊行年代在 1965 年，一方面符合錢崇威自稱「九十又五」之說，又瞿宣穎與周紫宜合著之《學詩淺說》、《文言淺說》等，亦是 1965 年前後在香港印售其初版。

皆頗能傳述《補書堂詩錄》一書詩心之所繫。唯兩序相隔十餘年，文中流露意緒，前者昂揚而後者壓抑，雖皆標舉《補書堂詩錄》一書的詩史價值，二者已映現迥別之閱讀策略與期待視野。

鍾序先以反駁時見所稱「或曰：『韻語自今將絕跡矣』」一語總起討論，展現五四一代知識人針對文體前途，每每自覺展開思辨的姿態。新舊文學論爭的餘緒，使這代文人選擇古典詩為寫作載體時，較諸前人的「習焉而不察」，反具更明確的文體自覺，頗留意著述在文學史中位置。在此脈絡下，鍾氏張揚「詩史」價值，推尊韻語（詩）之書寫職能難以被現代文體取代。他首先溯源中國詩學傳統，稱「吾國之韻語，伊古以來，通於國史」；進而標舉瞿宣穎身世際遇與詩學才能的超卓，言其「近世駭目忧心諸大事皆身所經歷」、「親受學於湘綺、葵園兩大師……民國初載，復嗣力於西方文學……當世賢豪固莫不重其文學聲名」、「君詩以一身之心情遊處為經，以當時之聞見為緯，讀一編，竟不如讀其日記年譜自傳，亦且不啻讀數十年間之史」。無論言詩論史，瞿氏其人其文俱有可觀。而「韻語通於國史」之論，亦成為序跋者心中理想的「詩史」標竿。⁶以詩記錄世變，既彰顯詩之價值，也踐履撰史職責。鍾氏最後以「將欲贊君，惟所謂『明乎得失，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數語差為近之。大凡一時

⁶ 此段「韻語通於國史」的論述，須連結下文「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等引文併觀，概念皆化用自〈詩大序〉。〈詩大序〉先以「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等語，標舉「風」的性質與作用，爭取詩人可為「國史」立言的空間。緊接則討論亂世中「變風變雅」之興起，且具論身為「國史」之職能。其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國史」在語脈裡，更像是對亂世中詩歌作者的期許。然則不可忽略〈詩大序〉原始的討論脈絡裡，國史之說尚須考慮「樂教」與「詩教」的社會脈絡。但近代文論將古史脈絡「斷章取義」式地移置與援用，也幾成常態。〈詩大序〉引文參閱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頁12-19。〈詩大序〉詩教背景的討論，則可見鄭毓瑜：〈〈詩大序〉的詮釋界域——「抒情傳統」與類應世界觀〉，收入氏著：《文本風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增訂版），頁250-263。

代必有一時代之人物，君為此數十年之人物，能發抒心聲以告後世，無疑此君之所以足重也」為結。在鍾氏的評論脈絡中，瞿詩在舊詩備受質疑之際振衰起蔽，既扛負史家職責，也承祧詩運嗣法，不僅足稱「詩史」，更可為一代人「發抒心聲以告後世」。詩史在此，指向詩人將自身聞見轉化為時代共通的記憶，他們是為歷史賦義之人，此亦「詩史」價值之所繫。

相對比下，錢序晚於鍾序十餘年後撰成，態度轉趨消極。雖亦稱「由蛻園之詩可以觀世變，則存之固足以為論史者之助也」，⁷僅視瞿詩為匡輔材料，殊乏「以詩代史」之雄心。錢氏亦引用「修辭立其誠」及「詩言志」等傳統詩學觀念提挈瞿詩寫作意旨。但論「言志」僅從個人經歷著眼，不再如鍾氏視瞿為時代之代言者。錢崇威更轉述蛻園本人夫子自道式的謙抑語，稱該作「詩不足存」，存者乃「存以驗昨非而今是之跡」。此語似暗示著：歷史的後見之明，可決定詩歌的傳世價值。當瞿宣穎須以自我批判之姿回顧平生，其「不溯既往，又烏知往者之非乎？又烏知能知往者之非為猶未晚乎？」的昨非今是之慨，實已頗見其「蛻園」晚境。「詩史」之說，至此被剝除參贊歷史建構的話語權。「過往」非但不能直接指引「當下」，且通過「詩史」記錄的往日崎嶇，還成為反諷性的「昨非」，對峙著「今是」。此與鍾序的「詩史」觀點可謂判若雲泥。

謄清稿本抄錄鍾序，最終並未付刻。撰於文革爆發前不久的錢序，則隱約透露此文獻及其作者，皆面臨「昨非今是」的窘境。鍾、錢俱稱瞿作為「詩史」，但「詩史」之面目定位，卻在言人人殊的評價中失焦。筆者認為二序對「詩史」態度的迥別，不能等閒視為觀點差異。正因當前所有關乎蛻園詩藝的討論，無一遺漏其企圖以詩之形式，涵攝史之職能的「詩史」第評。⁸但緣何鍾序視瞿

⁷ 錢崇威：〈瞿蛻園補書堂詩錄序〉，收入瞿宣穎：《補書堂詩錄》，卷前，頁1。

⁸ 瞿宣穎詩學造詣頗高，惟常被附論於掌故學或文史學成就下，但其「詩而兼史」的特質，常為論者稱道。如尹娟《班馬志業、王謝風流——論瞿宣穎的文獻學成就》指出：瞿宣穎在〈讀陸、馬二南唐書〉一文提出「史通於詩」之說，且成為其文史之學的創作綱領。陳煒舜亦標舉瞿氏敘述北平風土的《燕都覽古詩話》，有著文史兼容、以詩存史的貢獻。詩史傾向不僅展現在瞿宣穎的創作上，在注釋李白、劉禹

詩為照亮歷史的敘事，錢序卻直指瞿詩所呈現乃歷史光輝背後的暗影？唯有釐清二者差異，才可能真正廓清「詩史」的究竟面目。這不僅是針對「詩史」理論提出的反省，亦是緊扣《補書堂詩錄》文獻價值而發的探問。

舉凡創作於大時代背景下，作者曾閱歷興亡、遭際世變的舊體詩集，後世幾咸被以「詩史」之譽。讀者卻難直接由「詩史」一詞指涉，進而掌握詮讀該類文獻的適宜策略——該視「詩史」為一整世代的心聲，或僅保守認定其為作者的一隅之見？該視其詩為當下記憶的歷史真相，抑或須站在歷史的「其後」，回望判斷這些「詩史」的價值？同樣的「詩史」桂冠，卻映現紛紜的理論圖景。此中蘊藏文本真實（text reality）與歷史真實（historical reality）二者間的罅隙。⁹ 文論研究者也意識到：「詩史」理論之意義，不僅有反映「歷史事實」之型態，亦有反映詩人不斷進行自我詮釋、自我建構的歷史意志一體。¹⁰ 如何

錫等唐人詩作時，他亦注重「詩史互證」的發幽掘隱。因此鍾、錢二序俱提及以「詩史」為綱領實非偶然。然瞿氏生前雖受推重，死後卻可能因文獻流傳有限，或「落水」問題的潛在影響，目前還缺乏對其詩藝全面系統性的整理研究。但瞿氏詩學的「詩史」特質難以輕忽。前述研究成果可參陳煒舜：〈長教葵麥泣春風——試論瞿兌之《燕都覽古詩話》題詩之時空想象〉，《新文學評論》2018年4期，頁154-168。尹娟：《班馬志業、王謝風流——論瞿宣穎的文獻學成就》（長沙：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年，王建先生指導），頁24-27。

⁹ 詩史中「文本真實」與「歷史真實」之辨析，以及二者不完全吻合之說，為嚴志雄探討錢謙益詩時提出的重要論點。嚴氏在建構「明遺民性詩學」理論時，意識到錢牧齋行止及其歷史評價上雖係「貳臣」，但無妨其文本中展現的遺民性情感。見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4-8。嚴志雄在其英文所著博論中早倡此說，其論述進一步完整的英文版本，亦可見 Yim, Lawrence C. H. (2009).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1-10.

¹⁰ 此論可參見蔡英俊對「詩史」理論的系列辨析。他指出早在1983年，龔鵬程已意識到「詩史」與「史詩」在本質和文類上皆有區別。在龔的基礎上，蔡英俊更進一步結合臺灣古典文論的學術脈絡，步步論證詩史概念除了「詳實」的表現方式以外，亦有另種型態是「擺放在當事者心境的證明與自我的解釋」，亦由此帶出歷史敘事牽涉的記憶與認同，其實都是關於「選擇」，而非著眼於事件本身。見蔡英俊：〈歷史、敘述與認同：抒情傳統論述視野下的「歷史」與「敘事」的問題〉，收入李貞

通過既有的「詩史」論述暨相關研究成果，重新廓清關於瞿蛻園詩藝中的「詩史」意義，此必是判斷《補書堂詩錄》價值的關鍵步驟。

關於近現代「詩史」箋釋傳統的理論資源，多建立於對陳寅恪詩文創作與箋釋方法的辨析上。論者亦由此建構出「詩史互證」的詩文批評觀，成為近代文論史的斐然一頁。¹¹ 鑒於瞿宣穎在其同儕輩，乃至後世獲致的各種「詩史」稱譽，考究《補書堂詩錄》的「詩史」問題，不僅是接近其詩藝核心的敲門磚；亦是理解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寫作舊詩時，其所懷抱之「詩史」意圖、方法與詮釋局限的重要個案。倘能掌握此間變化精髓，或將為近現代文論聚訟紛紜的「詩史」論述，提供另個重要的理論參照。

為澄清「詩史」之書寫內涵，下文擬先以《補書堂詩錄》的版本梳理為基礎，逐步推導該文獻存在的「故吾」與「新我」現象。而基於此現象形成的重層歷史敘事，亦將鋪墊出豐富的「詩史」層次。詩歌記錄的「過往之跡」，並非「歷史現實」的實錄，而是詩人選擇記憶、建構歷史的意志展現。藉由「新我」與「故吾」的參照比對，詩人在時間之流中，擇取記憶、書寫建構的光與影、明與暗，終能在二者之間朗然自見。

慧主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12-14。

- ¹¹ 發皇陳寅恪之「詩史互證」法，使其成為詮釋詩作重要典範者，可以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所立下的「義寧心法」與「心史說」為里程碑。余英時標舉陳寅恪深信詩文之「古典」必然與「今典」對映的批評方法，使其詩史互證不只是「以詩證史」，更進一步可「以史箋詩」。此方法上揆「詩史」龐大的閱讀及書寫傳統，但也存在方法上的執謬。李貴生對陳寅恪詩文學方法論的學術史考掘，頗具參考價值。他指出陳寅恪這套方法不只針對史學研究而發，亦是重要的近代文論。雖則陳本人對這套詩史互證法，有近乎「信仰」的偏執，但此論亦有闡揚詩史價值處。見李貴生：〈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國文學報》第62期（2017年12月），頁237-282。李貴生：〈陳寅恪典故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9年6月），頁341-388。

二、《補書堂詩錄》中的「故吾」與「新我」

引言述及的鍾、錢二序，看似針對同一作品而發，描述的也是同一人身所經歷並撰作的「詩史」。「詩史」是在詩歌中反映現實的訴求。¹² 但若將詩歌與歷史二者的「反映」關係，圈定在鏡像式的靜止對照狀態，實無法呈現「時間」對歷史與詩歌同時產生的作用——當時移事往，詩歌可被修訂為不同版本，歷史亦可被重述為不同觀點之敘事。據此，1950年代成稿的《補書堂詩錄》，與1960年代經修訂的《補書堂詩錄》，是否還具備同一性？哪一個又更接近於「史」？它所反映的「詩史」，又是否還指向同一道「既往之跡」？研究者已通過研究牧齋詩文，指出詩人反覆重構敘事，以期建構更接近理想自我的情志主體，此類乎傅柯「自我技藝」的書寫現象，實乃詩史詩學的重心。¹³ 「詩史」隨時更易的線索，亦將銘刻在文獻的蛛絲馬跡中。《補書堂詩錄》因其諸版本間，有著歷歷可見的修訂過程，遂能反映歷史敘事與情感的變動軌跡，形成宛若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的「故吾」與「新我」。

（一）《補書堂詩錄》版本概說

現存公藏圖書館的《補書堂詩錄》版本，至少有三。除復旦大學所藏，成

¹² 張暉在對「詩史」概念的歷代演變進行充分考掘後，指出無論定義如何紛雜（他整理出歷代定義多達十七種），詩史的核心精神即是強調詩歌對外部現實生活的紀錄與描寫。但張暉對「詩史」理論的反省和警覺，也主要扣緊於「詩」的文類特質和其抒情傾向。他指出「詩」的文體特質不長於敘事，因此唯有把握詩歌的體制與美學，掌握語言文字細微差異，才可能真正理解「詩史」所欲傳達的訊息。張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修訂版），頁276-290。

¹³ 「自我技藝」（technique of self）之概念，是嚴志雄探討錢謙益詩藝時，鎔鑄傅柯理論與牧齋晚年詩論提出的觀點。嚴志雄注意到牧齋以「文」為媒介，積極鍛造自己的主體性，進而通過一次次在詩文中「自傳性時刻」的再現，引導、打造出文本中的主體。系列討論，可具見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頁36-66。

稿於1950年左右的謄清紅格稿本第一冊（收錄時間自1909至1936年以前）外，亦有1965年在香港付梓之線裝油印本。另外尚有成稿於1940年代，瞿宣穎以「兌之」筆名，在擔任主編的淪陷區文史雜誌《中和》月刊上，連載其個人舊體詩，專欄名稱亦作「補書堂詩錄」。¹⁴《中和》月刊上連載的《補書堂詩錄》，收錄範圍為現存香港本甲編1909年至1941年間的作品，或可視為《補書堂詩錄》的最早樣態。田吉曾比較前述三版本《詩錄》內容之異同，並主張：

《中和》所載，反映了抗戰中瞿氏對所作詩歌的選擇。謄清稿本約抄錄於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收入了抗戰中未發表的部分詩歌。六卷影印本則為瞿氏手定之本，通過其對舊作的去取刪潤，可窺其晚年對自己經歷的認識。¹⁵

田吉按時間順序，勾勒三版本前後相承的修改歷程，並認定復旦本的主要貢獻在於「補入」未收詩；最晚出的香港本，則是瞿氏對自己一生詩與事的最終去取。田吉視各版本為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並以最晚出者為其「晚年定論」。此說看來順理成章，亦是別集研究者處理同一作者不同階段成稿作品時的通則。然而付諸實際研究，瞿宣穎個人遭遇的特殊性，或許才是《補書堂詩錄》具備多重版本，且彼此間互不述及的根本原因。

被田吉視作最終本的《補書堂詩錄》六卷本，亦即本文所稱香港本，付梓名義為「長沙瞿蛻園宣穎」。此書甲、乙編以1946年瞿自北平移居上海為界。甲編收錄1916到1946年中秋節詩作，乙編為1946中秋後至1953年前後詩。中和本、復旦本、香港本收錄時代範圍不同。即使在時間重疊的範圍內，三版本的收詩篇目、詩歌字句等，亦存在明顯差異。三版本間的修訂改動，以及詩

¹⁴ 《中和》月刊的「補書堂詩錄」專欄，最早出現於3卷1期（1942年1月），頁146-149。該年除3卷2期外，其餘各期皆刊有「補書堂詩錄」。1943年則有1-3月刊登，1944年則是4、5、10月有連載、1945年連載則見6卷第3、4期合刊本。本文引用之《中和》月刊，皆以其原始期數、頁數標明之，不另標註在2007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之合訂本中的冊數及頁數。

¹⁵ 《瞿宣穎年譜》，頁5。

作篇目的刪汰去取，毋寧可視為《補書堂詩錄》反覆修訂重製的痕跡，而非不斷優化增補的過程。此中的「故吾」、「新我」之辨，又與瞿氏晚號「蛻園」由來密切相關。

錢崇威反覆昭告瞿宣穎的「昨非今是」，瞿氏晚號署為「蛻園」，皆暗示瞿本人冀望前塵往事當如蟬蛻，今日之我合如新生的心願。這是鍾序隻字未提的撰作背景，亦是錢序最重要的討論框架。瞿氏曾於 1938 至 1945 年間，出任過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新民印書館董事，以及國立編譯館館長等諸項「偽職」。¹⁶ 此即他後半生亟欲擺脫的「昨非」。從其晚年事蹟看來，「落水」經歷對他一生造成的磨難斑斑可見。¹⁷

作為流傳最廣的最終版序文，錢序似有意導引讀者將集中所存「舊作」，直接當成瞿氏的「過往之跡」；讀者也極易將香港本的「過往之跡」，疊合在其他兩版本的時間序列上。但暗藏機鋒處，全在「對舊作的去取刪潤」一語——經過去取刪潤後的「新我」，是否還能為封印於前塵往事中的「故吾」代言？又是否仍符合過往詩作發表時所得到的「詩史」令譽？《補書堂詩錄》的版本問題，不能僅從「作者晚年手定」的角度看待，而是須將「何種版本更接近『詩史』」的問題意識納入考量。《中和》月刊本連載於中日戰爭期間，復旦稿本為瞿宣穎戰後躲避漢奸審判追捕，赴上海定居時所作。¹⁸ 晚年自定手稿，則撰

¹⁶ 相關事蹟見《瞿宣穎年譜》，頁 145-174。

¹⁷ 瞿之外孫女金章和曾提及瞿宣穎對出任偽職事的態度是：「他一直很怕人提到這段歷史，自己也不願回憶這段往事」。1949 年後瞿宣穎曾參與《辭海》編纂，金章和云：「因為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對外公布的編輯人員中沒有他的名字」。見金章和：〈外祖父瞿兌之的人生軌跡〉，《人物》2012 年第 4 期，頁 73-75。

¹⁸ 王汎森指出《傅斯年檔案》中有瞿宣穎妹夫聶其傑（1880-1953，號雲臺）舉報瞿宣穎為漢奸信件。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頁 205。陸灝循該線索找出信函原檔，內文云瞿宣穎：「遁至上海，投奔舍下，隱匿樓上。本人無法使其他走，惟有請求設法逮捕，以免受累。但望嚴守秘密，勿說鄙人報告為荷。」見陸灝：〈聶雲臺揭發瞿兌之〉，氏著：《不愧三餐》（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年），頁 178-179。

成於 1960 年中期，亦即他在文革風暴中因言獲罪前夕。三版本各自有對應的時代語境，不同版本裡，反映不同的歷史意圖，即是本文所欲證成的「故吾」與「新我」之別。

（二）被刪削的「故吾」

三版本中，時代最晚的香港本，削除諸多深具指標意義的舊作。例如吳宓在《空軒詩話》全文逐錄並大加稱譽的〈辛王詠史詩〉二十四首，¹⁹係吟詠九一八事變至一二八事變間中日情勢的組詩。在 1942 年 12 月刊行的《中和》月刊中，此作仍維持原有規模，詩題改作〈讀史雜詩〉。²⁰香港本刪至僅存八首，更名為〈讀晉書〉。²¹原詩中諸如「王褒不辭周宏讓，異國論交事可師」等流露厭戰意緒，尋求與敵合作可能的詩作，以及批判張學良（1901-2001）不堪託付家國重任的「大事全應關豎子，近來時事斷堪知」等時評，香港本皆不見存。²²以西安事變為題材的〈上源驛行〉，乃瞿氏曾特意向吳宓展示的得

¹⁹ 吳宓曰：「予最愛兌之所作〈辛王詠史詩〉前後二十四首，曾倩其以錦箋寫貽，供我玩讀，今錄于下。此詩蓋始於民國二十年（辛未）九一八瀋變乍起，至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春三月滬戰終結為止，其事（所謂今典）當為讀吾集者所能識也。」吳宓著，吳學昭整理：《空軒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217。又此組詩作曾以「大詔」筆名，發表於《大公報》8 版文藝副刊（1932 年 5 月 23 日）。

²⁰ 《中和》3 卷 12 期（1942 年 12 月），頁 129-130。

²¹ 《補書堂詩錄·甲編》，卷 2，頁 9b-10a。

²² 分見原作第九及第十四首。第九首全作詩云：「五郡三州有別離，越禽代馬惜參差，王褒不辭周宏（弘）讓，異國論交事可師」，化用庾信〈傷心賦〉描述戰亂時父子兄弟離散於五郡三州的名句，拉出越禽代馬各具懷鄉之心的啟發。瞿宣穎復以王褒羈留北周時，因懷鄉情緒湧動，請梁朝處士周弘讓之弟周弘正攜回書信的史典，探討國土分裂情勢下，為順應人之懷鄉天性，「異國論交」前例未必不可遵循。第十四首：「王敦死去付安期，斷乳今能幾日兒。大事全應關豎子，近來時事斷堪知」，「豎子」指承繼父業的張學良，瞿在此直接進行褒貶，認為張尚不足堪擔負重任。

意之作。²³ 1943年《中和》月刊刊載此作時，題後還附上小注「丙子長至作」，使所詠事件指涉更為明確。²⁴ 此詩在香港本中，亦遭完全抹除。再以復旦本相校，〈辛王詠史詩〉（或稱〈讀史雜詩〉）被更名為〈春日雜詠史事〉十四首，但前論述及的「異國論交事可師」，或深責張學良為「豎子」等作，亦已消失無蹤。唯復旦本保留組詩最末「史筆他年附鄭箋」之吟詠，仍見瞿氏有意以「詩史」自任的創作企圖。²⁵

描寫西安事變的〈上源驛行〉，復旦本詩題增潤為〈上源驛雜詠史事〉。在稿本過錄批語中，沈其光稱譽此作「鉅製足以抗手梅村」。倘若〈上源驛行〉得以錄入香港本，必會被視為典範性的「詩史」大作。但瞿氏晚年手定本，似乎全不顧念這些代表詩作的存佚。如果僅以時間最晚且經作者手定的香港本，作為考掘詩人「過往之跡」的依據，瞿氏當時的心聲心曲，勢必湮沒無聞。如此使他在重大歷史事件中消音的刪削行為，似已違背「存以驗昨非而今是」的初衷。

前引這些被認定具「詩史」意義的大作，以序文和詩作存佚情形看來，至少在《中和》本及復旦本階段，都還備受推崇。那麼最後編定香港本時發生的大規模刪削，箇中原因及反映之心態，便更顯耐人尋味。經刪汰後，瞿氏原本對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等歷史大事懷持的鮮明立場，再也無從指認。修訂後的「新我」似頗不欲碰觸「通敵」、「禍首是誰」等政治禁忌。以版本現象結合瞿氏後來際遇，這一刪削的時空背景，極可能與反右氛圍高漲的1950年代

²³ 1937年2月21日的《吳宓日記》嘗提及：「4-5至大佛寺，牛排子胡同一號宅，訪瞿宣穎（兌之），進洗沙元宵、炒麵、炸年糕等點心。宓年年來兌之宅食此，而歲月不居，戀愛無成，今猶為無家之客，老已倏至，於是宓心又大傷悲！兌之出示近作〈上源驛行〉，藉史事以詠西安事變。詩甚典重，故佳。又談時局，不悉記。」吳宓：《吳宓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6冊，頁76。

²⁴ 《中和》月刊4卷3期（1943年3月），頁110-111。

²⁵ 〈春日雜詠史事〉最末一首詩為「春日登樓憶仲宣，哀時庾信獨潸然。杜陵詩意尋常會，史筆他年附鄭箋。」香港本無此作，《中和》本、復旦稿本皆有之。

末至 1960 年代相關。文網的管控以及詩人的自我審查機制，竟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趨於嚴酷。即使所論與當朝直接的政治禁忌無涉，鮮明的政治立場仍選擇趨於隱微。

（三）「新我」與「故吾」之辨

如田吉所述，復旦本確實補入一些《中和》本未收之詩。但若以《詩錄》甲編卷 1 收錄詩作的時間（1909-1927）為範圍進行考校：香港印本收詩 62 題，復旦本收詩 104 題，中和本收詩 83 題，篇目參差頗大，但香港本收錄最嚴。範圍內僅香港本獨收的詩作，僅有〈壬子元日在上海〉，此詩後文另有分析。復旦本則以作於 1916 年的〈西湖理安寺〉與〈游靈隱遇雨小坐冷泉亭，返至湖濱〉、1923 年之〈詠南巡事〉、1925 年〈重到嶽麓二首〉、〈漢口驛賜別無竟北行〉、〈愛山屬題其先將軍成都軍署畫〉等詩為獨見，多係補充瞿宣穎少年遊歷江南，往來湘鄂間等事蹟詩作。²⁶ 獨見於《中和》月刊者則有 3 卷 4

²⁶ 因此版為孤本不易得見，故將詩依序引出。〈西湖理安寺〉：「九谿十八澗洄沿，澗水篁風脆拂弦。磐石苔封青玉案，碧蘿花覆紫金錢。別禽嬾啄香臺粟，晴竇稀聞法雨泉。自在禪房堪永晝，不勞龍井聽茶煙。（寺中可貨真龍井茶）」。
〈游靈隱遇雨小坐冷泉亭，返至湖濱〉：「白香山昔曾留詠，元左司來始製亭。終古風雷藏薈黑，至今雲氣宕空青。橋頭忽散千風雨，水沫平添萬顆星。坐待晚晴還起去，蟬聲相送別西泠。」
〈詠南巡事〉：「江山臺殿冠林霏，冷燕依然下翠微。御愛樹空樟葉散，聖因寺老柳絲飛。一家滿漢承恩別，七郡蘇杭望幸稀。惟有道旁獻賦者，上方文倚被光輝。（《酌泉錄》一書猶存直筆）」。
〈重到嶽麓二首〉：「湘川憐再渡，磴道鬱初盤。半得城郭勢，兼殊輿曠觀。白雲舒畫寂，赤植向秋乾。挾策吾將老，松鄰舊講壇。／雲麓宮前路，淒迷澗壑沼。楓杉移舊植，冠劍有新阡。仙磐雲中鶴，吟節日暮蟬。游人誰會得，四絕枉唐賢。」
〈漢口驛賜別無竟北行〉（此詩稿本天頭有朱筆「刪」字）：「不逐南枝穩，翻能北俗諳。轉蓬俱異縣，移柳又江潭。我怪兵間慣，君仍道味耽。蒼茫前歲事，淒動客懷堪。節冷茱萸佩，江涵翡翠簪。沙鷗歸浩瀚，江燕訴呢喃。戍鼓營門疊，垂楊驛堠驂。不知聯騎樂，何日鳳城南。」
〈愛山屬題其先將軍成都軍署畫〉：「畫展生綃世幾更，籌邊樓望古今情。槍纍如讀西京賦，闌錡分從北府兵。武帝英靈殊未已，華陽士女尚能名。當時使宅文昌並，記我初生在錦城。」此詩有批語云：「闌錡應作蘭瓶讀。」此數詩都可見瞿氏少年行跡，且已頗多述及自己「南人仕北」之懷。

期〈歸化城感張江陵主順義峰事〉、3卷7期〈卓二君庸邀集玉泉山自青榭分韻得襟字有序〉、〈丙寅四月重到福昌殿戲題〉、3卷9期〈有小銅章，失去經年。小汀自市場骨董攤上購得以余歸，紀以六言三首〉等。²⁷細按此間的「新我」與「故吾」之別，似乎在《中和》本趨於「故吾」的詩句裡，瞿宣穎更願意流露對舊時風物、前朝故地的懷眷。〈歸化城〉一作，有「未必李陵終負國，頗嫌王歙坐封侯」一語，顛覆歷史人物的固有評價。〈邀集玉泉山〉則有長篇詩序追述自己少年時，經頤和園每「問劫灰於胡僧，識遺聞於老監」，表現追想承平、懷念前朝之慨。

²⁷ 《中和》月刊雖不難見，但這些獨見之詩，確實展現瞿宣穎追懷舊朝與倡議異族融合的心態。〈歸化城感張江陵主順義峰事〉詩云：「威紆亭嶂古豐州，上相和戎費蓋籌。未必李陵終負國，頗嫌王歙坐封侯。板升屋換旃裘俗。骨朵裙添玉貌愁。欲就遺民詢往事，年年春隴把鉏耰。」〈卓二君庸邀集玉泉山自青榭分韻得襟字有序〉：「光緒壬寅至丁未之間，侍先公於海淀直廬。歲常以春末居園，寒冬復還。時則受書之暇，奉杖多娛御宿之旁。往遊常遍問劫灰於胡僧，識遺聞於老監，奉誠易主，柏梁既災，固已追想承平，感慨係之者矣。庚申再入都，星紀已更，滄田無處。每因假日重覓前游，流連壞壁之前，躑躅荒陂之上，覩斜陽之在樹影不暫移，臨明漪以照顏皴還非故。人間何世，家國之感既深，桑下重來，佛屠之情無已也。卓子君庸與余屢共郊游，獨專勝境。先於靜明園得水田一區，治畦亭流，夷坡構屋，塔影當戶，宮塹作鄰，借西山之遙蒼，分玉泉之餘黛，簞簞新種，遙映於書窓；葭莢自生，披縈於釣艇。顏曰自青，尚其實也。爰以乙丑仲冬觴，賓落之分韻賦詩，哀成小集。簪裾盛事，輒近稀焉。顧余曾有結鄰之息壤，差如此地之主人，記風景於前朝，閱流光於二紀。遂書所感題於卷末，用存故實，以諗同游云爾。」該詩云：「小築來依御宿深，停車還許灑塵襟。日浮湖淥常延榻，嵐定風光自出林。深貯黃花過雁候，新栽叢竹已龍吟。看君還勝邊先著，多恐棲遲負夙心。」〈丙寅四月重到福昌殿戲題〉：「液池新祓戰塵黃，依舊簷鈴語夕陽。但喜尊前能鬪在（樂天〈得此代夢〉在又云：「世上爭先從盡汝，人間鬥如吾鬥在。」蓋唐人昔語也），送人作郡看何妨。」此處小注所稱之「得此代夢」應為白居易詩「代夢得吟」，詩句亦小有出入，但「尊前能鬥在」意指及時行樂。〈有小銅章，失去經年。小汀自市場骨董攤上購得以余歸，紀以六言三首〉：「累贅故嫌身外，姓名本畏人知。挂肘元無福分，滿腔不合時宜。／破銅爛鐵砸廁，閒坊冷肆經行。居然已千秋想，何事更身後名。／再來已迷故處，此去定入誰家。多賴故人相愛，不教淪落天涯。」

平心而論，三版本最明確的差異，並非詩作的「補入」，而是後出版本對瞿氏戰時已發表詩作的大幅度刪削。瞿宣穎在《中和》本展現出的「故吾」，並不遮掩年少樹功建業的雄心，於前朝更是多所追懷。這是他在復旦本猶見發揮，香港本卻全不述及的心態。雖說文人編訂文集時，屢易詩稿或自刪少作等舉動皆屬常態。但《補書堂詩錄》之刪削，事涉瞿氏從「身臨淪陷」到「親歷光復」後政治氣氛的翻轉。描寫中日戰爭或西安事變的〈辛王詠史詩〉及〈上源驛行〉，無疑是重要的「詩史」標的。在鍾介民序以及復旦本批語中，仍保留瞿氏師友對該類作品的交口稱譽，香港本對此類詩作卻一應削除。與其說這些刪詩是「棄稿」，毋寧應視其為文人編訂文集時「自我壓抑」現象的鐵證。²⁸

《補書堂詩錄》多重版本間展現的「新我」與「故吾」，非僅是校讎學意義上的版本差異，而是今昔相異時空脈絡下，詩人不斷嘗試弭平歷史敘事與自我認同間裂隙的「縫補」。「詩史」書寫不只反映外部世界變化的過程，也同時彰顯自身歷史認知調整的軌跡。而這類的文獻特徵，在《補書堂詩錄》針對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所作的「讀史吟詠」中，更能清晰展現。

三、觀史思今知進退：讀史吟詠中的史觀轉變

涉及改朝換代之吟詠，是重要的「詩史」題材。《中和》月刊本的《補書堂詩錄》中，有〈癸丑正月讀史〉、〈壬戌十月十三日觀史〉、〈甲子十月詠史集義山句〉、〈戊辰十二月朔日瀋陽讀史〉、〈讀史和哲維〉及〈讀史雜詩〉諸作。此類詩題嵌入讀史、詠史字面之詩，不僅意在寓寄今事，其詩題之設計

²⁸ 「自我壓抑」概念由王汎森提出，用以探討清初文人迫於文字獄壓力，產生某種自我審查以迴避當局禁忌的寫作特徵。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393-500。瞿宣穎自刪詩稿的行為，應類同這種基於自我審查所展現的「自我壓抑」現象。

更帶有「避言」策略。²⁹ 以詩作存佚狀況論，復旦本中，前述詠史、讀史詩作大致維持既有規模，字句略見調整。³⁰ 香港本中，前述詩作留存數量則未及一半，讀史、詠史字面亦屢遭刪除。即使詩作留存，字句刪訂後，史觀亦有隨之轉換的空間。

為呈現《補書堂詩錄》不同版本間詩文字句和內蘊思想的變化，本節鎖定包括民國改元、遜清帝后婚喪，以及北京事變等重要「詩史」事件，以不同版本《詩錄》字句的比勘細讀，析論瞿氏在這一系列讀史吟詠中，由「故吾」轉向「新我」的史觀變化歷程。

（一）吟詠改元：從傷「故國變亂」到詠「新朝歲華」

1912年民國改元，是瞿氏初次見證的「改朝換代」，此乃懷抱歷史意識者「觀世變」的絕佳題材。但整部《詩錄》未有直接記述民國肇建之作，僅香港本卷一的〈王子元日在上海〉詩，提及「改曆初看國步遷」。³¹ 該詩以遷居上海、迎春納福為旨，並未觸及朝代易鼎的歷史認同問題。該作以一派迎新納福氣象詠「新朝新歲」，又是少數編年早於1946年，最終於香港本所獨見之作，極可能為後來補作。瞿宣穎何以不正面吟詠民國肇建？或可從以下二詩找到端倪。

²⁹ 如顧炎武詩集中「詠史」諸作亦類此。王冀民箋顧炎武〈詠史〉一詩云：「大凡借古諷時之作，每以『詠史』為題以避文網，古人詩集往往可見。」清·顧亭林著，王冀民箋釋：《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下冊，頁604。「避言」之說則參考淺見洋二論述。他認為這種普遍存在的「避言」策略，來自文人的言論和創作活動常和國家統治權力產生衝突，須以「避言」方式從事寫作以避禍。（日）淺見洋二著，李貴、趙蕊蕊等譯，李貴校譯：《文本的密碼——社會語境中的宋代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64-66。

³⁰ 復旦本仍保持「讀史」題目者，有〈讀史三首癸丑正月作〉、〈十月十三日觀史〉、〈十二月朔瀋陽讀史〉、〈秋日讀史〉。略改詩題者則有〈秋日集義山句〉，改題並刪除部分詩句的作品，則是更名為〈遼鶴〉的〈讀史和哲維〉。

³¹ 〈王子元日在上海〉，《補書堂詩錄·甲編》，卷1，頁2b。全詩云：「改曆初看國步遷，迎春仍喜歲華妍。梓桑已隔潛行地，梅柳爭迴欲曙天。朱戶黏雞芳勝曩，銅街驟馬曉鐙圓。奉親娛日徒增感，辛苦東來寄一廬。」

寫於 1911 年重陽的〈九日寧鄉山中〉，描寫武昌起義期間，長沙一帶四方倏擾，時聞暴徒趁亂擅闖民宅、濫殺劫財事。此時瞿府舉家避兵寧鄉山中，唯宣穎兄長瞿宣治（1887-1923）當時在京且消息難通。³²《中和》月刊本此作詩題為〈辛亥九日寧鄉山中〉，尾聯「二親頭並白，雜亂涕如霖」。³³直白表露瞿鴻機（1850-1918）憂懼在京家人安危，且頗視辛亥革命為「變亂」之心緒。³⁴復旦本詩題改作〈九日寧鄉山中避兵〉，字句全同《中和》本，但加上說明時事的小注。³⁵香港本則模糊處理原詩中的「避兵」問題，尾聯更將原來透露焦心情緒的「情語」，置換為富含比興意象的「景語」，詩云：

作客全家去，逢秋九日陰。雨垂花自秀，風急雁遺音。

北訊無由達，南遷日更深。瀉山掩關處，松壑自蕭森。³⁶

修改後，「松壑自蕭森」迴避直白的情緒表達，亦不指明所謂「作客」實為「避兵」。全詩沒有直接褒貶，卻流露壓抑氛圍。瞿氏家族沒有感受革命帶來的雀躍，詩中僅呈現茫然憂懼的心境。

另首寫於 1913 年 1 月下旬的〈自長沙寄上湘綺師，時將入北都，過上海群公有詩，因次韻四首錄一〉，則有較直白的「易代之悲」。香港本亦未收錄此詩，下據《中和》月刊 3 卷 1 期引出全詩：

³² 田吉據《止齋年譜》、《太夫人行述》等瞿氏家族文獻，對瞿氏家族避兵寧鄉、再遷湘潭，局勢稍定後先返長沙，後輾轉至上海的過程敘述甚詳。見《瞿宣穎年譜》，頁 40-42。

³³ 此詩《中和》月刊題作〈辛亥九日寧鄉山中〉，見《中和》3 卷 1 期（1940 年 1 月），頁 146。

³⁴ 另一旁證是瞿鴻機有〈長沙變起予避甯鄉山中尋東下抵滬作〉詩，詩一開頭即云「亦知人事危，豈悟世變速」，後半寫及他們舉家驚險抵達上海租界經過，結尾云：「神州漢家土，不信遽沉陸，淒涼少陵淚，暗向江頭哭。」流露亡國黍離之悲。清·瞿鴻機：《超覽樓詩稿》，《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據民國二十四年鉛印長沙瞿氏叢刊本影印），第 772 冊，頁 479。

³⁵ 復旦稿本更有自注曰「北訊無由達」係因「仲兄方履京師」，「南遷日更深」後則注云：「議欲更往湘潭」。

³⁶ 〈九日寧鄉山中〉，《補書堂詩錄·甲編》，卷 1，頁 2b。

駕鳳陵霄別故居，遠臨滄海望姑餘。便看天賜歸鶉首，何意餘年待鶴書。

范粲無言逃秦始，管寧還郡值黃初。試推土火相乘術，早認元城五鹿墟。³⁷

詩題所謂「湘綺師將入北都」事，指當時袁世凱（1859-1916）有意延聘王闓運（1833-1916）入職國史館。王氏起初態度遲疑，1912年底則以送兒女乘船為藉口，順道至上海與寓滬諸老為詩酒之會。³⁸席中群公頗相勸諫於王闓運，盼其勿為袁世凱所用。瞿宣穎在頷聯、頸聯，流露與當時遺老們立場相仿的情緒。在遜清遺老群體的歷史認同裡，民國改元乃「鶉首賜秦」³⁹之偶然，並非新政權德配其位。湘綺老人縱以韶齡獲得詔聘賢良的「鶴書」，也宜慮及己身出處是否符合朝代易鼎時的政治道德。頸聯所用「范粲無言」與「管寧還郡」典故，或標舉范粲「不言三十六載」以堅拒司馬政權；或歌詠管寧皂帽鄉居，不願仕於曹魏，皆屬不就新朝徵聘之典型。⁴⁰此立場同於滬上遺老對王闓運生涯抉擇的期許，雖則王氏仍於1914年赴任。此作《中和》本及復旦本見存，香港本則將此作與另篇為王闓運頌壽的〈仙巒篇上湘綺先生〉一併削除。對「鶉首賜秦」的感嘆，以及類乎遺老情懷的出處論述，香港本已不見蹤跡。取而代

³⁷ 《中和》3卷1期（1942年1月），頁148。復旦本此首詩題前批註有「刪」字，全詩字句多同《中和》，但「何意餘年」四字改為「何意高年」。

³⁸ 王闓運在1912年11月及1913年1月《日記》分別記載宋教仁及湯薌銘來見王闓運，傳達袁世凱有意禮聘他北上就任國史館館長。見清·王闓運：《湘綺樓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15冊，頁3974、3996。又送女北上順道過滬事，見1912年11月6日記。

³⁹ 「鶉首賜秦」典出張衡〈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言天帝酒醉，以金策分土，使秦穆公盡取鶉首分野之地。此典比喻得位者因偶然之幸坐擁山河。東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2、24-25。

⁴⁰ 唐·唐太宗御撰：《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隱逸傳·范粲傳〉，頁4b。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魏書·管寧傳〉，頁22b-33b。

之的，是喜迎 1912 年元旦的「新我」。讀者唯有從其他「故吾」版本裡閃現的詩句中，方能刺取瞿宣穎面臨清室覆亡的真正心情。這也正是詩文所能提供不同於正史敘事的歷史視野。詩歌捕捉下的記憶片段，反映的是詩人對當下情境流露出的主體情志，與其政治上的實際作為雖可相參照，卻未必等同。瞿宣穎大學畢業後曾供職北洋政府多年，他本人亦不乏接受新式教育、推廣進步運動的事跡。⁴¹ 詩文呈現的情感內涵，提供在個人仕履外，另一道解讀個人情感認同的窗口。這樣的內心幽隱，是經由「新我」與「故吾」的對照後，方能擷取到關於記取與遺忘間的文本痕跡。

（二）揣想遜清：隆裕太后輓詞中的「亡國」與「讓國」

以〈癸丑正月讀史〉為題的隆裕太后輓詞，為瞿氏現存作品中，寫作時間最早的讀史詩。香港本刪除此組詩作第一首，且淡化題目的時間線索。由較早出現的詩題可推知，此詩所詠事件發生在癸丑年正月（1913 年 2 月 6 日至 3 月 7 日）間。由於民國報刊如今俱在，隆裕太后（葉赫那拉·靜芬，1868-1913）的逝世細節亦不難從當年報導獲知。這組詩作的「詩史」價值，其實不在事件細節或日期的補述，而是其中流露的史觀。

復旦本將此作更題為〈讀史三首·癸丑正月作〉。復旦本詩句改訂處，多已被香港本沿用。復旦本還提供另外的版本修訂訊息。凡字句改訂處，復旦稿本幾乎都另以硃筆覆寫了原本《中和》月刊所用文句，顯示後者未必是「棄稿」，而是不同時空情境下的詩句選擇。下表以時間最早的《中和》本為底本，以表格呈現這組詩的文獻增刪現象：

⁴¹ 瞿宣穎擔任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及參與普及教育運動等事蹟，可參見邱怡瑄：〈執拗的低音——舊詩文中的五四運動〉，收入王德威、宋明煒主編：《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年），頁 148-149。

表一 《補書堂詩錄》中〈癸丑正月讀史〉組詩的刪、改、存

《中和》本 〈癸丑正月讀史〉 ⁴²	之一 玉輦忘還竟未回， 黼帷明月照泉臺。 鮒隅山曲新靈馭， 龍躍池頭舊劫灰。 身毒鏡昏花有淚， 東平衣黯篋難開。 杜鵑啼血宮鶯冷， 猶助三清鳳吹哀。	之二 武帳珠襦事已空， 雲旗中夜掩靈風。 不關破璽尊文母， 豈意持縑出漢宮。 玉樹聞歌應賸淚， 黃花微識料難終。 龍鸞一去蒼梧遠， 地變天荒恨未窮。	之三 揄狄天風下紫泉， 六宮容衛尚依然。 瑤池宴罷歸王母， 嵩谷傳聲送上仙。 豈有玉魚陪葬地， 料無銀海出他年。 金鑾誰記殘鐙事， 惟見千門起野煙。
復旦本 題目改為〈讀史三首·癸丑正月作〉	與中和本大抵相同，惟第七句改為「寒鴉瑟縮千門道」。	武帳珠襦事已空， 雲旗中夜掩靈風。 不關破璽尊文母， 亦異持縑出漢宮。 素奈歌長猶未覺， 黃花識早 ⁴³ 料難終。 堯幽舜死俱陳跡， 地變天荒數載中。	揄狄天風下紫泉， 桃符餘慶尚依然。 掖庭舊事悲長御， 嵩谷傳聲送上仙。 見說珠邱遲復土， 料無銀海出他年。 ⁴⁴ 萬邦宗魯猶觀禮， 記取崇牙壁翼邊。
香港本 刪第一首，題目改為〈讀史〉 ⁴⁵	全刪	同復旦本	同復旦本

⁴² 《中和》3卷1期（1942年1月），頁148-149。

⁴³ 「微識」改為「識早」，應是配合上句對句中的「歌長」而改。

⁴⁴ 「見說珠邱遲復土」用晉代王嘉《拾遺記·虞舜》典故：「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丘」。此指光緒帝陵寢當時尚未竣工。崇陵修建及奉安等費用由民國政府承擔，原亦為《清室優待條件》所載明，但崇陵修纂一度因經費停工，遂有梁鼎芬（1859-1979）到南洋募捐續修崇陵事，後才由袁世凱派趙秉鈞（1859-1914）和清室內務大臣商議處理。高伯雨：《聽雨樓雜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頁158-164。

⁴⁵ 《補書堂詩錄·甲編》，卷1，頁3a-b。

組詩第一首，首聯「玉輦」指天子車乘，帝王車乘該還而忘還，象徵斯人已杳。⁴⁶第二句「泉臺」用法類同於駱賓王〈樂大夫輓辭〉中的「忽見泉臺路，猶疑水鏡懸」，意即「黃泉路」。隆裕太后 1913 年 2 月 22 日丑時間於紫禁城內升遐，正值陰曆癸丑年元宵後兩天，此符合詩境中「明月引路，國母新喪」之描寫。「龍躍池頭」句寫宮殿昔年勝景如今滿布劫灰，詩人以此象徵皇室凋敗。腹聯以「身毒鏡」對「東平衣」，「花有淚」對「篋難開」，屬對工整，不僅傳達物存人亡的哀思，也暗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中「今送光烈皇后假紼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典故，⁴⁷揣想宣統帝往後僅能憑衣篋以悼嗣母。尾聯寫宮中儀仗行經門道光景，《中和》本原句作「杜鵑啼血宮鶯冷」，用「望帝失國而死，其魄化為杜鵑，日夜悲啼，淚盡繼以血，哀鳴而終」之意象，哀弔清皇室的亡國之慟。復旦本則作「寒鴉瑟縮千門道」，此或襲用王昌齡〈長信秋詞〉中「玉顏不及寒鴉色」句意，⁴⁸藉班婕妤因趙飛燕姊妹失寵典故，類附於隆裕太后因珍、瑾二妃失寵於光緒帝之本事。

審度二版本的描寫側重，「杜鵑啼血」強調失國之慟、帝后相繼崩殂之殤，「寒鴉瑟縮」則描摹隆裕太后不再因「寒鴉」失色。雖則此一華麗復仇，發生於夫亡國滅之後。沈其光曾稱「此種詩非熟讀少陵玉溪集，不能下一字」。⁴⁹瞿宣穎奧隱幽微的文字風格，於此盡顯其義山家數。敘史述事全以典故出之，典故成為替代敘事及細節描寫的語言策略。「事義」之呈現，全繫於對典故的

⁴⁶ 此處詩意之詮釋，蒙匿名審查人慧眼指出：就詩句章法言，首聯「玉輦忘還」應指光緒帝，次聯則寫隆裕太后新喪，句旨方不重複。下文之杜鵑泣或宮鶯冷，皆是太后過世時的場景底色與聲光。此解較之筆者原本將兩聯皆解釋為隆裕升遐場景更為深刻，未敢掠美，特識於此。

⁴⁷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東平憲王蒼傳〉，頁 18b-19a。

⁴⁸ 唐·王昌齡著，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89-93。

⁴⁹ 此係復旦稿本批語，署名為「瓶翁拜識」。沈其光年長於瞿宣穎，故自稱「瓶翁」。

熟知與取義。縱使詩作主題未曾變改，從中和本到復旦本，已通過典故置換，使其內在指涉意涵悄然更易。隆裕的「亡國」之悲被淡化，反而轉向描寫她備極哀榮的喪禮。值得點出的，尚有此作詩題的改易歷程，越往後的版本線索越隱微。但瞿宣穎用典謹嚴，無論有無「癸丑正月」為時間提示，光由此詩使用東平衣篋、武帳珠襦、漢宮持縑等俱出自后妃傳典故，早已揭明詩中人物的皇室身分。只是這一由顯漸隱的表述方式，也多少反映瞿氏讀史吟詠轉趨幽微的修辭策略。

輓詞詩旨相近，組詩描寫仍各見側重。第一首以隆裕臨終淒清場景對比其死後哀榮；第二首則圍繞其「讓國」功業發為感嘆；第三首則主要描繪喪禮場面與各方致哀。香港本刪詩之由雖不明確，但瞿宣穎最終修改的版本，使此作不至落入其父兄輩孤臣孽子式的輓詞套式。⁵⁰ 然則三作之中，第二首詩最能傳達瞿宣穎對遜清太后的「蓋棺論定」。首聯用《漢書·霍光傳》「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⁵¹ 典故，寫垂帳聽政事已成空，後句的「雲旗中夜」，亦暗合隆裕太后深夜升遐情境。頷聯後文句皆圍繞隆裕太后「讓國」事蹟而寫。《中和》本及復旦本頷聯原皆作「不關破璽尊文母，豈意持縑出漢宮」。香港本將「豈意」易為「亦異」。僅兩字之差，詩旨卻由此翻轉——由於「持縑」典出

⁵⁰ 第三首詩首聯之「揄狄」乃王后之衣，「紫泉」乃「神仙所飲泉水」，首聯仍以「升仙」寫隆裕之死，與第一首設意類同。次句以「桃符餘慶」語點出后薨時序在元宵後兩天，宮中尚有春節氣氛。頷聯原是用「瑤池宴罷」、「嵩谷傳聲」等升仙意象寫國母之喪，詩旨稍見重複，遂改作「掖庭舊事悲長御」以映出皇宮時局。頸聯原作「豈有玉魚陪葬地」，後改「見說珠邱遲復土」，皆寫崇陵尚未修竣，隆裕靈柩尚不得安奉事。尾聯「金鑾誰記殘鐙事」改為「萬邦宗魯猶觀禮」，原本詩旨主要在嗟歎前朝往事已不得聞，修改後版本則強調萬國公使皆來觀禮，削淡原詩的哀輓太后並輓亡國的氣息。瞿作修改前，詩旨與其父瞿鴻機〈孝定景皇后挽詞〉五律四首頗似，只是其父詩作中諸如「傷心白衣會，不見百官來」等語，幾乎純以孤臣孽子筆調而作。瞿宣穎的七律組詩語言精煉，且修訂後的歷史見解，已異於瞿鴻機的遺臣角度。〈孝定景皇后挽詞〉見清·瞿鴻機：《超覽樓詩稿》，卷3，頁7a-b。

⁵¹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年），卷68，頁2939。

東漢獻帝伏皇后出逃漢宮時倉皇持縑，卻遭下臣以刀刃威逼事。⁵² 這段「血濺后衣」的典故，道出漢獻帝與伏皇后當時處境之凶險，落難之倉皇。香港本將「豈意」改為「亦異」，按原本「豈意持縑出漢宮」句解之，是說「無涉於焚符破璽的違背信約之事，隆裕太后仍被尊奉為國母，並未意料自己處境將如伏皇后持縑出宮一樣，會受到下臣恫嚇相逼」。改為「亦異」後，詩意則變為「無涉於焚符破璽的違背信約之事，隆裕太后遭遇也不同於伏皇后持縑出宮之處境，她並未受下臣威逼」。這一修改，讓原詩替隆裕訴苦的意涵大為減輕。敘事內涵亦由關於「亡國慘禍」的描寫，演變至對隆裕太后「讓國功業」的稱頌。歷史脈絡的轉換，正是輓詞今昔版本間最明顯的差異。

宣統三年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清室，在接受南京方面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提出《清室優待條件》的前提下，頒布退位詔書。按協議內容，清室往後「尊號仍存不廢」，民國政府亦當以對待外國元首之禮優遇之。民國政府應提供歲用四百萬兩的經濟挹注等優待條件，亦為條例載明。但光就「歲用」問題論，民國政府便從未履約。此處詩句所謂「不關破璽」，多少有點暗諷民國政府言而無信的意味。⁵³ 瞿宣穎若繼承其父執輩的歷史認同，視民國得位為「鶉首賜秦」的意外，則對新政權之上台，不免仍有情感上的拒斥。因此由「豈意」到「亦異」的文句改動，是標舉隆裕太后的「讓國」舉措，使之取代曩昔「亡國」的悲情陳述。隆裕形象亦隨詩句改動扭轉，

⁵² 「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見《後漢書》，卷10下，頁19b-20a。

⁵³ 《清室優待條件》對清室承諾的種種優遇，在1924年時由馮玉祥所發動的「北京政變」中全部毀棄。當時攝政內閣黃郛以大總統名義向溥儀發函，宣布永遠廢除帝號，且將清室後裔逐出紫禁城。當時胡適曾致函內閣，表達此舉不僅有違道義，且有違反「國際條約」之嫌。但輿論及法界亦有反駁此論者，指出同一土地上無法並存「兩個合法國家」。事件始末、相關爭議可參楊天宏：〈「清室優待條件」的法律性質與違約責任——基於北京政變後攝政內閣逼宮改約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頁37-57。

這也牽涉接下來數行詩句的修改方針。腹聯原作「玉樹聞歌應賸淚」，由於〈玉樹後庭花〉曲有明確的亡國暗示。瞿宣穎在較晚版本中，改用中性的「素奈歌長」作為對太后新喪的書寫。⁵⁴隆裕背負的「亡國」哀感被淡化，形象也被改換為主導「讓國」之人。對已然「易代改元」之現實，「隆裕讓國」的歷史詮釋，安頓遺老們此刻並未力抗民國的政治抉擇。他們既能通過致哀先后懷想遜清，卻以「政權和平轉移」的敘事弭平認知矛盾。遺老們無需首陽采薇，痛作遺民，仍可旌揚遜后志節，並安頓自己的出處。

此詩尾聯，《中和》本作「龍鸞一去蒼梧遠，地變天荒恨未窮」，用《禮記》「舜葬於蒼梧之野」典故，寫帝后相繼謝世。如此下筆頗嫌平淡，不如後來版本以「堯幽舜死」一語，道盡隆裕太后一生悲劇的高潮與反諷。即使「讓國」是瞿宣穎後來擇定的歷史觀點，但他亦同時意識此說的諷刺性。復旦本及香港本中，此句皆已改作「堯幽舜死俱陳跡，地變天荒數載中」。表面上，新舊版本都在寫朝代興亡猶如轉瞬雲煙，實際來說，「堯舜」典故更有一層趨近「今典」的內涵。

根據當時所攝相片，隆裕逝世後的國民哀悼會會場，靈堂中央高懸「女中堯舜」四字匾額。⁵⁵時任國民哀悼會主祭的參議院院長吳景濂（1873-1944），亦於哀悼公啟中致祭曰：「隆裕皇太后以堯舜禪讓之心，贊周召共和之美」。這一「女中堯舜」美稱普遍見於時論。但「堯幽舜死」一詞，明顯襲用自李白〈遠別離〉詩的「堯幽囚，舜野死」句意。瞿宣穎校注〈遠別離〉時，曾指出歷代對此詩之說解，當以王世懋（1536-1599）及沈德潛（1673-1769）說法最為近情。王世懋謂李白係因「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幽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

⁵⁴ 素奈花即蘋果花。《晉書》載：「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後因以簪素奈花為哀悼皇后之象徵。《晉書》，〈后妃傳下·成恭杜皇后〉，頁2a。

⁵⁵ 隆裕靈堂照片可見左遠波：《清宮舊影珍聞》（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101。

而作〈遠別離〉。」⁵⁶ 沈德潛則稱「玄宗禪位於肅宗，宦者李輔國謁上皇居興慶宮交通外人，將不利於陛下，於是徙上皇於西內，怏怏不逾時而崩。詩蓋指此也。太白失位之人，雖言何補？故託弔古以致諷焉」。「幽憤」與「失位」，既是李白當年處境，也是瞿宣穎此刻心情。以「堯幽舜死」句領尾聯，不僅照應現實對隆裕的評論，亦指明她真正的處境。被另類幽囚宮禁中的遜國皇族，承受新政權的霸凌，卻也無力反抗歷史巨輪的輾壓相逼。瞿宣穎意存深諷的，是民國政府對遜清皇室種種「焚符破璽」之舉，也感嘆隆裕太后一生活在鋪滿針氈的宮闈中，所謂「禪讓」，亦不過「堯幽舜死」式的徒具虛語。

前述由「亡國」到「讓國」的史觀轉換，也往下貫串至第三首作品的描寫中。第三首詩尾聯原作「金鑾誰記殘燈事，惟見千門起野煙」，化用李商隱〈燒香曲〉詩「金鑾不問殘燈事」典故。此用唐太宗追問蕭后「隋主如何」語，引出勝朝舊事已不得聞的易代之悲。⁵⁷ 修訂後尾聯作「萬邦宗魯猶觀禮，記取崇牙壁窰邊」，寫當時駐京各國公使紛紛致唁弔哀，此般描寫，加固了「清室」與「民國」間，似應是「國」與「國」關係的平等地位。瞿宣穎對「讓國」史觀的強調，和今時讀者習見的革命史觀頗有出入，卻提供對這場國葬的另種觀看角度。

隆裕被美化的決斷力，乃至刻意揚升的歷史地位，是一套撫慰人心的話術。或能暫時安頓遺老們對新政權的拒斥，緩解他們對歷史現實乍然來到的悽惶。「詩史」的內涵若非經由「故吾」與「新我」之間的對讀加以顯相，我們無由觀察到瞿宣穎在不同版本歷史敘事間，意念遷移的軌跡。「既往之跡」其實不純是「新我」，也不全在「故吾」，恰恰在「故吾」與「新我」之間。

⁵⁶ 〈遠別離〉之說解，見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271-2280。

⁵⁷ 馮浩注「金鑾不問殘燈事」，引《紀聞》云「貞觀時除夜，太宗言蕭后同觀燈，問曰：『隋主何如』」之記載。蕭后回答頗憶煬帝當年每至除夕時，「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之盛況。但時移事往，「作伴者唯有瓊人，而宮中舊事不得再問矣」。唐·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增訂重排本），頁2060，註14。

（三）勝朝宮史：銷聲匿跡的追懷宣統詩

1. 清帝大婚：等待庾肩吾

隆裕太后逝世後又歷十數年，紫禁城迎來嶄新的歷史時刻。《中和》月刊3卷4期登載〈壬戌十月十三日觀史〉，復旦本改題作〈十月十三日觀史〉，香港本不錄此作。將詩題所標明年月換算為西元曆法，此作係為1922年12月1日宣統大婚而寫。詩云：

傳呼綵杖上椒塗，再見承平鹵簿圖。追恨吳霜歸鬢晚，南朝唯少庾肩吾。⁵⁸
后妃居室例以椒泥塗飾，此詩先寫帝王迎親隊伍盛況。清室遜位十一年後，北京城內竟再度出現「承平鹵簿圖」（鹵簿即天子儀仗）光景。這一發生在「宣統十四年」的宮廷大婚，重演帝國繁華，卻多少予人時空錯置之感。⁵⁹瞿宣穎對此事的描寫側重，顯然不在儀式細節的鋪陳，而是通過末句的「追恨吳霜歸鬢晚，南朝唯少庾肩吾」，傳達其興亡之感。該句化用李賀〈還自會稽歌并序〉詩意而來。李賀原序云：「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以應和皇子。及國勢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今無得焉，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⁶⁰李賀自稱要「代庾肩吾追想君王」以補其悲，瞿宣穎反用典故，借由同樣「國勢淪敗」的背景，嗟嘆易代後，宣統「無可為其述悲之人」。在清帝大婚的喜慶場景裡，瞿宣穎卻隱隱寄託興亡之慨。

「追恨」句須與長吉原詩對讀。李賀極力刻劃老境頹唐的庾肩吾懷想往日，舊時宮殿已呈現「野粉椒壁黃，濕螢滿梁殿」的殘敗。相形之下，瞿宣穎眼前的「承平鹵簿圖」雖有熱火烹油、花團錦簇般的熱鬧，但宣統與清室日益孤絕危殆的處境，卻與庾肩吾背負易代亡國的惆悵殊無二致。即使溥儀婚禮的

⁵⁸ 《中和》3卷4期（1942年4月），頁152。

⁵⁹ 此次婚禮細節可參陳熙遠：〈共和國裡的皇室婚禮——宣統大婚與帝制王朝的最後掙扎〉，《近代史集刊》第94期（2016年12月），頁77-129。

⁶⁰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注：《李賀詩歌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34-36。

綵杖儀隊依然步履威儀，觀禮百姓再也無法回到「承平之世」。

少了歷史的後見之明，瞿宣穎無法預測遜清王室後來命運。他亦無從知曉兩年後，因北京事變導致的「宣統出宮」事件中，遜清遺老交相唱和奔走，頗為溥儀費心籌謀，並不缺少心念舊君的「庾肩吾」。⁶¹ 這類懷想遜清的遺老情懷，常被誤認僅有少數實際參與「復辟」活動，或涉入「滿州國」政治運作之人才擁有。瞿宣穎之吟詠，卻提供被歷史主旋律湮沒的另類聲音。追想舊朝、心念舊君的遺民性文本，其實也滲入這批缺乏實際政治作為者的吟詠中。即使瞿宣穎的最終定本裡，未敢留下任何這樣理屈詞窮的「既往之跡」。

2. 溥儀出宮：傷春惜故主

時間來到 1924 年 10 月，馮玉祥（1882-1948）率兵包圍紫禁城，他的軍事行動，徹底改變溥儀一生命運。11 月 5 日，鹿鍾麟（1884-1966）奉代理大總統黃郛（1880-1936）命令，脅迫溥儀遷出紫禁城，《清室優待條件》至此完全撕毀。《中和》月刊 3 卷 6 期的〈甲子十月詠史集義山句〉即為詠此事而作，復旦本改題為〈秋日集義山句〉，香港本依舊完全抹除此詩曾存在的痕跡。

此詩為集句詩，詩風類乎宮體，場景人物句句與宮苑春情相扣。但若非詩題的「詠史」提示，讀者很容易就忽略此類詩作實則寄寓「今典」。箋釋《補書堂詩錄》時，這一「今典」與「古典」相對的基本框架，確實是重要的引路石。〈甲子十月詠史集義山句〉詩云：

嚴城清夜斷經過，永巷長年怨綺羅。遠路應悲春畹晚，高情不動碧嵯峨。

金鑾莫問殘鐙事，玉殿猶分下苑波。何日桑田俱變了，不關秦地有山河。⁶²
首句櫟括自李商隱〈贈歌妓二首〉，指靜夜斷絕行人之際，思念之情愈加難

⁶¹ 劉威志曾分析朱祖謀的〈鷓鴣天廣元裕之宮體八首〉，並指出對溥儀出宮事，當時人有系列吟詠，當中不乏遺老們對溥儀及清室前途的憂懷與籌謀。劉威志更分析朱祖謀之立場心態，指其雖不贊同復辟，但對「故主」心存護惜，故其文學書寫背後有一「理屈詞窮」的詮解脈絡。見劉威志：〈清遺民的理屈與詞窮：論朱祖謀〈鷓鴣天廣元裕之宮體八首〉〉，收入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第 23 期（2017 年 10 月），頁 197-232。

⁶² 《中和》3 卷 6 期（1942 年 6 月），頁 143。

已。⁶³次句引自〈淚〉，寫幽閉宮中長巷的宮女長年愁怨、淚濕綺羅。⁶⁴綜以論之，「嚴城清夜」狀寫紫禁城人去樓空，「永巷長年」則以詩中愁怨宮女形象，喻託溥儀身世。按瞿宣穎用典之習慣分析，帝王典故通常詠帝王家事，藩鎮典故則多以詠民國軍閥。此作皆用宮闈典故，被詠之人身分必與宮廷密切相關。

次聯的「遠路」和「高情」句，分別出自義山詩的〈春雨〉與〈聞歌〉。⁶⁵「遠路」一句化用宋玉〈九辯〉的「白日晼晚其將入兮」，設定詩中主人公在年時欲暮之際，踏上茫茫遠程。因集句體例，此詩移借的是李商隱〈春雨〉詩的傷春情境，而非宋玉〈九辯〉原作的悲秋之懷。「悲春晼晚」乍看雖不符合北京事變發生時的深秋時序。但遜清遺老詩詞中，每有以「傷春」寫「哀國」，以「落花」悼「勝朝」的前例。⁶⁶此處傷春，所傷者實為帝國再也無從振作的局勢。連結下句之「高情不動碧嵯峨」，亦指當時遜清王室已無法得到輿論民心支持。溥儀在這樣背景下遭逐出宮，踏上茫茫無措之旅程。〈聞歌〉有謂是李商隱聞開元法曲流落民間，為之愴然感賦而作。⁶⁷瞿宣穎此處以「高情不動」對比「遠路春晚」，隱喻溥儀的伶仃際遇。開元宮樂流落民間的意象，亦可狀帝王的落難民間。腹聯上半「金鑾不問殘鐙事」，同樣暗指前朝故事已莫可聞問。下半「玉殿」典出〈曲江〉。⁶⁸曲江與御溝相通，此處「御殿猶分下苑波」

⁶³ 《李商隱詩集解》，頁 1997-1999。

⁶⁴ 同前註，頁 1820-1828。

⁶⁵ 〈春雨〉及〈聞歌〉分別見《李商隱詩集解》頁 1969、頁 2072。

⁶⁶ 以落花傷春悼遜清之詩作分析，可見胡曉明：〈陳寶琛王國維吳宓陳寅恪之心靈詩學〉，《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2 卷 5 期（2014 年 9 月），頁 545-560。

⁶⁷ 此說見陸崑曾《李義山詩解》，錢謙益則指出〈聞歌〉之章法與〈淚〉相似。詩中典故皆有使人聞之斷腸的特徵，如銅雀臺歌後，西陵事已不得聞；瑤池歡會後，仍是兩相相離各不相知、昭君怨、楚妃怨等，更皆有物是人非之意，縱非必有聞「開元法曲」之本事，此詩意境亦當與開元亂後之時代滄桑、王孫落難有關。《李商隱詩集解》，頁 2073-2074。

⁶⁸ 同前註，頁 148-149。

指宮中之水流出宮外後，與民間之水混流。李商隱寫〈曲江〉詩時，句句與杜甫〈哀江頭〉相對，卻意在吟詠甘露之變。此處瞿宣穎以曲江之水之流向，帶出地變天荒、昇平不返的書寫主題，同樣描寫盛世王朝的無可挽回。尾聯分用〈寄遠〉⁶⁹和〈咸陽〉⁷⁰詩句，寫滄海易為桑田，遜清易鼎民國。典故中透露此滄海化桑田的劇變，或僅是「鶉首賜秦」般的偶然。雖非直言，瞿宣穎已於不少作品中再三流露對民國政府「坐擁山河」的不以為然，以及對遜清皇室處境的同情。

倘若不以《補書堂詩錄》中的「故吾」詩篇為證，僅就瞿宣穎仕履經歷推想，或逕由修訂後，對此不置一詞的「新我」為文獻基礎，便極難指認出瞿宣穎曾存在遺老情懷式的歷史認同。「詩史」之價值，或即是在官方歷史敘事的主調外，劃定出另一個以個人心史為主體的記憶之場。個人行為可用史料判斷，個人心境卻只隱藏在詩歌文字的幽隱線索裡。無論這些作品是否能留存在瞿宣穎晚年最終定本內，卻都是其心境情懷的見證。單線的歷史敘事，經由「詩史」的參與，能衍化出交錯的重層，提供更多元的歷史視角。

由「故吾」蛻為「新我」的版本修訂歷程裡，層累著瞿宣穎宛若年輪的過往之跡。恰恰得由最表層的「新我」作為參照變項，才能昭昭顯示其「故吾」存在的舊蹤。《補書堂詩錄》中的史觀轉換與自我壓抑，究竟是「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抑或只是詩人自我補全其歷史敘事的記憶認取行為。無論答案為何，「詩史」在今昔對比的轉換對照裡，更能表現它作為某一時刻、某一情境下，詩人意志閃現的痕跡。

四、偶開天眼覷紅塵：詩史吟詠中的春秋史筆

相較對遜清帝后的溫情緬懷，《補書堂詩錄》有另一套關於「讀史吟詠」

⁶⁹ 同前註，頁 1978-1979。

⁷⁰ 同前註，頁 1711-1713。

的書寫主題，並與東三省風雲密切相關，展現的是另種「冷眼閱興亡」的情懷。雖則這系列詩作在香港本中，亦遭大量刪除。顯示在瞿氏「新我」的脈絡裡，懷想舊朝的溫情既不可留，批判當朝的冷眼亦不可恃。唯有從「故吾」與「新我」的對讀裡，才能留下春秋史筆的變化軌跡。瞿宣穎有意調度各種「讀書識史」的知識資源，對當時史事提出針砭。「詩史」在瞿宣穎的書寫實踐裡，不只有「詩」的抒情審美，亦有「讀詩識史」的知識力度。

（一）諷喋血奪權

〈戊辰十二月朔日瀋陽讀史〉載於《中和》月刊3卷9期。此詩香港本未收。戊辰年十二月，即西元1929年1月11日至2月9日，配合「遼海」提示，及詩中多用「功臣遭殺」典故，可推知此詩係為張學良殺楊宇霆（1886-1929）事而作。詩云：

靖安坊裏佳人怨，歌舞華堂夜未停。坐上即收常子閣，簷頭新動秀支鈴。

出門逐獵知何晚，剖腹燃鐙夢不醒。笑我暫飛遼海鶴，白雲城郭望冥冥。⁷¹

1929年1月11日，瀋陽張氏帥府驚傳舉國震駭的消息。深受張氏父子倚重，在東北權傾一時的楊宇霆與常蔭槐（1876-1929），突遭張學良下令處死。張學良對外宣稱二人阻撓東北易幟大業的推行，在以大局為重的考量下，他雖感艱難，仍決心痛下殺手。⁷² 此詩押下平九青韻，維持瞿宣穎一貫大量用典的風格。這裡的「用典」依然符合古典、今典相映的書寫模式。

首聯出自劉禹錫（772-842）〈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唐元和十年（806），

⁷¹ 《中和》3卷9期（1942年9月），頁139。此詩復旦本有錄，且字句皆同，題目作〈十二月朔瀋陽讀史〉。

⁷² 據《大公報》載，張學良發給胡若愚（1894-1949）之通電云：「去夏以來，弟力主倡導和平，促成統一，而楊常動持異議，力加阻撓。如關內之延不撤兵，灤東五縣之不肯交還，鐵路車輛之不允分撥，均為彼等所主持。……長此以往，不特東省治安之不保，且於國家統一有妨。……忍痛處置，殊非本懷。」〈張學良鎗斃楊宇霆：事件發生於前晚常蔭槐同死，張已發通電調楊常阻撓統一〉，《大公報（天津版）》3版（1929年1月12日）。

宰相武元衡（758-815）力主削藩，被節度使李師道（？-819）銜恨刺殺於靖安坊東門。劉禹錫聞訊作〈代靖安佳人怨〉詩輓之。⁷³ 瞿用此典故，影射張學良力主歸附蔣介石，楊宇霆則希望維持東北軍既有的獨立地位。從典故知識資源的調取，瞿宣穎給出他對此駭人大案成因之判斷：張、楊二人在對蔣和、戰立場上的矛盾，埋下此案殺機。次聯「坐上即收常子閣，簷頭新動秀支鈴」，二句皆典出史書著名隱語。常子閣又作成子閣，典出《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⁷⁴ 諸葛恪（203-253）乃孫權（182-252）臨終託孤之輔政大臣，因專權擅政，遭孫亮（243-269）及孫峻（219-256）設伏刺死。楊宇霆為東北元老，素有「小諸葛」之譽，此處以諸葛恪故事，類附至楊宇霆生平際遇。作為被託孤的老臣，楊氏卻死於幼主伏殺。「秀支鈴」典出《晉書》，亦有權臣遭戮之指涉。相傳石勒（274-333）伐劉曜（？-329）時，眾人皆謂不可。佛圖澄（232-348）以相輪鈴音與羯語諧音作出預測，力主「軍出捉得曜」。⁷⁵ 此詩的「坐上」及「簷頭」帶出了空間意象，寫楊、常二人於張家帥府老虎廳內遭遇伏擊。「功高震主」正暗示這場殺戮的淵藪。頸聯「出門逐獵知何晚」用李斯臨死前語於其子之語，慨歎：「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楊宇霆倘不事於張家父子之「天下」，或可安享晚年，如今兔死狗烹，恩翻作仇。下句「剖腹燃燈」殊不易解。筆者推測可能係用呂布（？-199）斬董卓（？-192），董卓橫屍燃臍的典故，以呂、董二人翻恩成怨之往事，

⁷³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008-1010。

⁷⁴ 其云：「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又有作常子閣者，皆反語石子岡也。蓋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投之於此岡。《三國志》，卷64，〈吳書·諸葛恪傳〉，頁14a-b。

⁷⁵ 《晉書》載：「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仆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仆谷，劉曜胡位也。叩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果生擒曜。」《晉書》，卷95，〈藝術傳·佛圖澄〉，頁12b-13a。

象徵張、楊二人之父兄情誼有始無終。此詩以「讀史」為掩護，實則重演瞿宣穎以史典類附今事的詩歌技藝。在當時各種鉅細靡遺的報導外，這樣的「詩史」吟詠，顯然帶有調動歷史知識資源，進而向特定讀者群以最精練字句，客觀陳述自己「史識」的企圖。詩作尾聯的「笑我暫飛遼海鶴，白雲城郭望冥冥」，乃瞿宣穎自己的現身說「史」，且用「丁令威遼鶴歸來」典故。⁷⁶ 事件發生時瞿適在瀋陽，目睹此驚心動魄大事之發生，卻自擬為偶過此地的「遼海鶴」，不過「暫飛」。城郭依舊，百姓依舊，他以相對超然的旁觀者姿態，冷眼記錄驚心動魄的喋血政變。調取歷史典故，記載軍閥政權的恩怨無常，並通過歷史典故的知識資源，直指歷史現象底下的深層原因。「詩史」包含的知識底蘊，在「現實」的反應外，更有一分「讀史早知今日事」的冷靜卓然。

（二）哀東北淪陷

一樣以「遼鶴」指涉東北事，作於1931年，刊在《中和》3卷11期的〈讀史和哲維〉，則明顯是為九一八事變而作。此作刊載在《中和》月刊及復旦稿本階段，皆附有黃濬（1890-1937）元詩。香港本僅存原作第一首，題目改為〈遼鶴〉，且一應抹除詩中與黃濬相關字句。⁷⁷ 或也出於某種懼於文字蠱禍而自我壓抑的心理。循前例，下文再以表格呈現復旦本和香港本中，異於《中和》本之字句：

⁷⁶ 《搜神後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晉·陶潛：《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卷1，頁1a。

⁷⁷ 黃濬於1937年8月26日被南京國民政府指控為「漢奸」處死。淪陷時期，瞿宣穎尚能為其出版遺稿《花隨人聖盦摭憶》，事見《近代史料筆記叢刊》的整理說明。黃濬著，李吉奎校點整理：《花隨人聖盦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6。戰後或者因漢奸審判的隱憂，瞿宣穎幾乎完全抹除自己與黃濬一切的交誼痕跡，《中和》本每見「和哲維」、「寄哲維」字樣詩，在復旦本、香港本中都遭刪除或改題。

表二 《補書堂詩錄》各版本之〈讀史和哲維〉

《中和》 本〈讀史和哲維〉⁷⁸	之一 卅年遼鶴又來歸， 城郭何曾有是非。 不待維州嫁門卒， 盡緣呂姥失戎機。 但驚漢幟來中夜， 已報周師更一圍。 懸廟擢筋甯抵罪， 如何禍首尚冥飛。	之二 漢過不先徒自詡， 齊交誤絕本難任。 連雞均勢機終破， 飲酖謀安患益深。 盟會因人還望救， 金縢輸虜定何心。 更聞囊瓦謀城郢， 太息神州士氣沉。	黃濬原詩 之一 夷甫諸人死不羞， 陸沉容易送神州。 阮灰未冷思秦地， 軍府猶羈傷楚囚。 屏盡士風繇黨禁， 時衰社鬼作人謀。 山河牛角嗟將及， 甲乙推排列莫愁。 之二 會之忤刻和終耻， 侂冑專貪戰亦非。 豈有沼吳忘教訓， 抵教詛楚事焚祈。 江淮秋漲仍千里， 松杏邊烽又一時。 何必焦頭誇曲突， 壑舟夜徙至今疑。
復旦本題目改為〈秋日讀史〉	之一 卅年遼鶴又來歸， 城郭何曾有是非。 詎⁷⁹待維州嫁門卒， 盡緣呂姥失戎機。 不先漢室空三表， 已報周師更一圍。 苦說賂秦猶晚計， 生鸛有雀自飛飛。	之二 漢過不先徒自詡， 齊交誤絕本難任。 連雞均勢機終破， 飲酖謀安患益深。 盟會因人還望救， 金縢輸虜定何心。 更聞囊瓦謀城郢， 太息神州士氣沉。	同《中和》本，錄二首黃濬原作，但未署名，僅曰「原作」。

⁷⁸ 兌之：〈讀史和哲維〉，《中和》3卷11期（1942年11月），頁129-130。

⁷⁹ 復旦稿本此處硃筆覆寫「何」字。

香港本 ⁸⁰ 刪第二首，題 目改為〈讀 史〉	異時遼鶴又來歸， 城郭蒼茫自是非。 詎待維州嫁門卒， <u>追論</u> 呂姥失戎機。 不先漢室空三表， 已報周師更一圍。 苦說賂秦猶晚計， 生鸛有雀自飛飛。	全刪	全刪
--	--	----	----

此詩各版本皆未繫年。但在以編年為序之詩集中，此詩排在辛未（1931）春什剎海唱和詩後，續接瞿宣穎遊富春江作品。據瞿宣穎發表在《旅行》雜誌上的富春江之旅小文，他當年十月底抵達富春江，可證〈讀史和哲維〉成詩於1931年10月底前。⁸¹

首聯轉化丁令威故事中「城郭如故人民非」之謠曲詩意，既見原典「城在人非」詩意，也另添「事理自有黑白」之意旨，點出此事公道自在人心，但較早版本之句意更近於「是非已然不分」。頷聯用唐代牛李黨爭時聚訟紛紜的「維州事件」典故。維州在今四川省汶川西北，是唐與吐蕃百年征戰交鋒的前線。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吐蕃將領悉怛謀以此地來獻。當時宰相牛僧孺（779-848）主張議和，直指吐蕃疆土「失一維州，無損其勢」，⁸²力勸文宗應將叛將悉怛謀送還吐蕃。因對此事立場不同，牛、李黨爭的對立遂更激化。李德裕（787-850）不滿牛相主張，力主不當棄維州，且在奏議中引出「維州嫁女門卒」之故事云：

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

⁸⁰ 《補書堂詩錄·甲編》，卷2，頁8a。

⁸¹ 瞿宣穎文中明確說出他與劉麟生共遊富春江事在1931年10月31日。見銖庵：〈扁舟憶往〉，《旅行》雜誌8卷11號（1934年11月），頁5-8。《瞿宣穎年譜》，頁115，銖庵為其常用筆名。

⁸²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卷172，〈牛僧孺傳〉，頁8a。

隴盡歿，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並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⁸³

「嫁女門卒」事頗似稗官言，卻點出維州位居戰略要津，值得為之遠計深謀的地位。當時牛僧孺力主循義締盟，維持與吐蕃長久合作；李德裕則主張把握利害，取得制敵先機。二人觀點分歧，勢成水火。唐代維州情勢的和戰之爭，與瞿宣穎 1930 年前後認知的中日關係，或可相類附，成為一套以「古典」對映「今典」的史論。日軍對東北野心昭然，東北一地之淪陷，雖不致影響全境存亡，卻如同日軍的「無憂城」，可執此地作為進入中國之門戶。蔣介石訴求不抵抗，積極尋求國際斡旋的對策，在瞿宣穎眼中，如同梁將呂僧珍（454-511）當年力主「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的避戰主張。⁸⁴這一求和舉措，導致了軍機貽誤。頸聯用當時時人傳誦最廣的〈北齊〉詩典故借古諷今。⁸⁵瞿詩以史典入詩，諷刺當時國府根本不須戎夷（此處影射日本）遠謀嫁女於門卒，早已自獻國土，不戰而敗。尾聯批判力道強而直接，《中和》本的「懸廟擢筋甯抵罪，如何禍首尚冥飛」，直指身為戰犯的張學良，不應仍在關內「鴻飛冥冥」。張氏或者號令張氏的人，理當為東北國土之失陷負責。修訂版本則批判當時割一州以保全國的「賂秦晚計」無法奏效，末句並引用《戰國策·宋策》中宋康王占「有爵生鸛」事，以較隱曲的用典方式，暗示即便「小而生巨」，無道者依

⁸³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準詔卻執送本蕃就僇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收入《舊唐書》，卷 174，〈李德裕傳〉，頁 10a。

⁸⁴ 「呂姥」事見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廿四史點校本），卷 11，〈列傳第五〉，頁 212。

⁸⁵ 同樣化用李商隱〈北齊〉「已報周師入晉陽」、「更請君王獵一回」典故，有意諷刺張學良者，當時還有馬君武。這是近代著名詩案，筆者曾以「假新聞」與「詩史」關係，探討渲染張學良在淪陷前夜，仍跳舞行樂導致貽誤軍機之傳說報導的公案。見其博論第五章〈報刊中的詩史虛實——以九一八事變到抗戰期間國難吟詠為例〉。邱怡瑄：《史識與詩心：近現代舊體詩「詩史」的觀念遞變與戰爭書寫（1840-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鄭毓瑜先生指導），頁 213-220。

然不足霸有天下。⁸⁶瞿宣穎在詩中滿溢憤慨，力主當戰則戰。倘不通過此種「以史箋詩」且深信「今古相映」式的解讀視角，後代讀者頗難獲知瞿作為何屢屢被推尊為「詩史」精奧之由。亦唯有通過如此詮讀，才能更加印證鍾介民〈序〉中這段評論的意義：

孰謂此事非關學乎？或曰：「君詩浩博如此，世無鄭箋，奈難索解人何。余以為是無傷也。君之典實雖多，然非濫用者，其比附精當處，後日史家必能識之。」

對當時猶抱存「韻語通於國史」理念的讀者而言，「詩史」不是純粹的文藝活動，它積澱的豐富知識資源，亦不只留予詩家為經典，更是後日史家「讀詩識史」的討論題材。

遭刪除的第二首詩作，同樣直指不抵抗方針之失。首聯「漢過不先」，用《史記·匈奴列傳》「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典故，諷刺一意孤行的「不抵抗」政策，就如同自詡「不先過」的漢室般，未能認清時勢，反自困於和平之虛辭。「齊交誤絕」以楚王聽任張儀讒言，欲以斷交齊國，來換取秦國的六百里商於之地典故，諷當時主政者如楚王般昏昧，誤判眼前利益輕重，終致因小失大。瞿宣穎在此詩展現他熟稔古典故的優勢，冷靜分析「連雞均勢」遭破壞的問題。當時國府希冀通過盟會（國聯）仲裁，以圖維持中日和平的舉措，在瞿詩筆下無疑是「飲鴆謀安」與「金縢輸虜」之舉。⁸⁷倘無防患未然之決心，必貽來日之深禍。

此詩的政治批判一樣出現於尾聯，所諷對象卻頗費疑猜。「囊瓦謀城郢」

⁸⁶ 此故事是以宋康王占得「小而生巨」吉兆，遂狂妄無道妄圖天下，終致敗亡。見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下冊，頁1219-1220。又此詩的兩種版本，原有版本意在指謫張學良過失，修訂後的「生鸛飛飛」，則應是象喻當時在中國勢無可擋的日本。

⁸⁷ 當時國府自1928年濟南事變起，每遇中日衝突，多採尋求國際仲裁手段，向國聯申訴。而九一八事變後，國府亦等待李頓調查團，但國聯制裁廢弱，日本不但拒絕國聯要求其自山東撤軍的決議，更憤而退出國聯。

原謂楚臣囊瓦謀多而誤國，此處影射何人？是他一貫批判的張學良，或係妄圖「先安內再攘外」的蔣介石？但無論所指何人，瞿宣穎在這些「詩史」吟詠裡，立場其實偏向「主戰」。這些力主抗日的詩作，1940年代卻能以《詩錄》名義刊載在被目為「漢奸刊物」的《中和》月刊。⁸⁸可證古典詩因層層典故包裹，反能以此「避言」策略，爭取一定言論空間。此例也呈顯個人和戰立場，往往隨時代情勢變化。1937年後附日者，未必不曾懷抱抗日心志。曾力主拚死一戰，並發為國難吟詠者，也未必一生都堅守同樣主張。倘未意識到詩作裡時空脈絡與個人選擇的變化，便容易形成僵固的解詩模式。如以瞿宣穎往後「附日」的出處選擇，猜想他可能由始至終皆主張與日親善，其戰時發表詩作，也必須無縫軌合於他的政治抉擇。等化「新我」與「故吾」的作法，必然形成詮解上的誤謬，亦有以後律先之嫌。

總體而言，瞿宣穎對東北情勢、九一八事變史事的詩史吟詠，特別著重分析歷史表象背後事件的成因，對戰略情勢的利害得失，亦頗具史識。與他書寫遜清王室題材詩作的情懷，明顯冷熱有別。本文所謂的「故吾」與「新我」，是力圖呈現這些詩史吟詠裡，詩人刻意或無意間流露的主體情志。也試圖指出不同版本中的抒情主體，亦可能產生自相矛盾與自我裂解的情形。詩中之「我」，未必吻合詩人外緣社會政治脈絡裡的出處抉擇，卻顯示他在歷史事件情境當下，通過詩歌書寫所昭昭自現的意志。掌握此種表達策略，才可能通過詩歌的言志抒情傳統，進而理解「詩史」的創作意圖，從而達致理解詩人一生心跡行事的詮解目標。

⁸⁸ 《中和》月刊因為收羅大量關於鴉片戰爭及晚清涉外事務的史料，曾被編入沈雲龍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但此刊編纂時，正值日本提倡「大東亞共榮圈」的年代，該刊遂被認為許多內容都涉及文化宣傳。見宋永生：〈「思想戰」之前沿陣地——《中和》月刊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彭劍先生指導）。但于靜、桑兵亦指出，即便不免存在宣傳中日友好的內容，仍不當忽略此刊廣蒐史料的學術價值。于靜：〈林辰藏淪陷區期刊——《中和》月刊〉，《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5期，頁70-75、桑兵：〈《中和》月刊解說〉，收入氏著：《交流與對抗：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5月）。

五、結 論

作為近代文史大家，瞿宣穎後半生的困蹟，與其死後之湮沒無聞，都和其淪陷時附日的出處選擇有關。他曾被期許為一代人「發抒心聲以告後世」的雄心偉志，亦隨《補書堂詩錄》文獻的大幅刪削，逐漸黯淡無光。從一代人之世變心曲，蛻化為一個人的「昨非今是」之跡。雖是謙抑之言，卻也一語道破將瞿宣穎稱為「詩史」時所遭遇的閱讀困境——沒有站在歷史發展風向上的「詩史」，是否仍足以擔當為歷史賦義的權責？但倘不以歷史的後見之明，對其政治抉擇加諸以民族主義式的道德衡判，《補書堂詩錄》或仍是理解其人其時代的重要媒介，也足以讓我們一窺詩歌文本裡蘊藏的幽微意志。

本文撰寫之目的，並非要消解詩史「反映現實」的基本視野，只是意識到「詩」或「史」，實皆具備隨時改易的潛質。與其期待「詩史」文本能無縫軌合於「歷史現實」，不如認取當中存在反映歷史現實的意志，並體認其流動的本質。意志有其選擇的主動性，詩歌的「記取」之處，亦必有其相應的「遺忘」之區。是以本文藉由梳理、廓清《補書堂詩錄》的今昔版本，考察文獻中展現的「故吾」與「新我」，並藉此反思和重探「詩史」理論。

瞿詩側錄許多歷史事件發生當下的情感與觀照，卻在時間的後續作用下，展現與原初版本不再一致的文本意圖。如對「民國改元」的看法，從哀嘆故國變亂，到自覺歌詠新朝。而其早年版本中俯拾皆是，類乎遜清遺老的黍離哀感之情，也隨著文獻改訂歷程逐漸淡化。本文仔細爬梳、考校《補書堂詩錄》在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各版本間的詩文差異，並確實指出其文字改動縫隙間，歷史觀點亦隨之改易的現象。如其哀輓隆裕太后的詩作裡，瞿氏通過典故置換，將隆裕形象由亡國遜后，替換為「讓國」的女中堯舜。將民國與遜清的朝代更迭，視為「禪讓」而非「革命」的史觀。在現今國、共兩黨為主導的革命史觀敘事下，這一獨特的歷史觀照，確實展現詩史保留歷史主旋律外聲音的功能。又如，瞿氏原本對遜清皇室覆滅，乃至其最後被逐出紫禁城的

遭遇都滿懷同情，且對民國政府撕毀《清室優待條例》的背盟棄約不乏微辭。但其最終版本裡，對此則隻字未提。甚或其作中，原本對東北易幟、張學良奪權、九一八事變等歷史大事皆有種種深刻褒貶。其善於藉由歷史典故之古今比附，傳達其個人春秋微言的詩史技藝，亦在其詩集的早期版本中歷歷可見。凡此種種，都可通過文獻比對，映照此間歷史意志變遷的軌跡。至此遂可逐步得證——《補書堂詩錄》裡的「新我」，無法為過去寫下的「故吾」代言，反之亦如此。這一方面展現出文人懼於言論管制，因此在其文獻修訂歷程裡，產生「自我壓抑」而轉趨隱微的徵象；但一方面也顯示出「詩史」如何呈現歷史記憶被反覆認取和書寫建構的過程。

即便存在詮讀上的門檻與陷阱，以詩歌作為歷史書寫特殊形式的「詩史」文論，仍是詮解《補書堂詩錄》這類反映大時代興亡詩作的重要引路石。但誠如研究者過往思考中國詩的文體特質時所指出，詩歌未必長於記述細節，讀者亦無法僅憑諸多隱喻性典故，就能直接獲取關於歷史的完整敘事。但「詩史」文本在反映歷史上的殊勝處，不在其精詳，在其扼要；不在其穩定，在其易於改動，且容易比對。

藉由考索瞿蛻園《補書堂詩錄》中「新我」與「故吾」之間的變化軌跡，本文試圖呈現詩人對每一歷史處境的定義與再定義。此一以詩定義的歷史意志，不止於當下眼前的事件，更及於過去的處境、乃至詩人思索自己未來在歷史中的評價。本文比較「新我」、「故吾」之異，原為凸顯此一意念。而此意念，與王摩詰作〈秋槐詩〉，吳梅村作〈圓圓曲〉、甚至錢牧齋寫〈後秋興〉的意念皆同。文學批評上，「詩史」作為詩學概念，其精奧處，不是單指一首詩或一組詩所反映的歷史片段，也不是白描或敷演一段過去事件的敘事過程；而是詩人以詩反覆定義世界、定義自我，書寫世界也書寫自我的意念。換言之，挪動典故，替換隱喻之際，正是詩人之「自我」與「世界」不斷碰撞後的展演，亦是詩歌對記憶、對歷史的反覆銘刻與自我定義。銘刻之一而再，定義之再而三，詩史在其中矣。

故曰，詩史不在「新我」，詩史不在「故吾」，詩史在「新我」與「故吾」之間。

（責任校對：王誠御）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周·列禦寇撰，張長法注釋：《列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戰國·莊子，曹礎基注說：《莊子》，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 何建章注釋：《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漢·張衡著，張震澤校注：《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晉·陶潛：《搜神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
- 唐·唐太宗御撰：《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
- 唐·姚思廉著：《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
- 唐·王昌齡著，胡問濤、羅琴校注：《王昌齡集編年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唐·李白著，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重印本。
- 唐·李賀著，清·王琦等注：《李賀詩歌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唐·劉禹錫著，瞿蛻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唐·李商隱著，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五代·劉昫：《舊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重印百衲本廿四史。

清·顧炎武著，王冀民箋釋：《顧亭林詩箋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清·王闓運：《湘綺樓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

清·瞿鴻機：《超覽樓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據民國二十四年鉛印長沙瞿氏叢刊本影印。

* 瞿宣穎：《補書堂詩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約 1965 年線裝油印本。

瞿宣穎：《補書堂文錄》，出版地不詳：1961 年自刊本。

高伯雨：《聽雨樓雜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 年。

沈其光：《瓶粟齋詩話三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 年《民國詩話叢編》本。

黃濬著，李吉奎校點整理：《花隨人聖盦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吳 宓：《吳宓日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空軒詩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二、近人論著

《中和》月刊，北京：中和月刊社，第 1 卷第 1 期（民 29 年 1 月）- 第 6 卷第 4 期（民 34 年 4 月），1940 年 -1945 年。

佚 名：〈張學良鎗斃楊宇霆：事件發生於前晚常蔭槐同死，張已發通電謂楊常阻撓統一〉，《大公報（天津版）》，1929 年 1 月 12 日，3 版。

于 靜：〈林辰藏淪陷區期刊——《中和》月刊〉，《魯迅研究月刊》2007 年 5 期。

大 弨：〈辛王詠史詩〉，《大公報（天津版）》，1932 年 5 月 23 日，8 版。

尹 娟：《班馬志業、王謝風流——論瞿宣穎的文獻學成就》，長沙：湖南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08 年，王建先生指導。

- *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年。
-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年。
- 王德威、宋明煒主編：《五四@ 100：文化、思想、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年。
- 左遠波：《清宮舊影珍聞》，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年。
- * 田 吉：《瞿宣穎年譜》，上海：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論文，2012 年，吳格先生指導。
- 宋永生：《「思想戰」之前沿陣地——《中和》月刊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論文，2012 年，彭劍先生指導。
- * 李貞慧主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 年。
- * 李貴生：〈文學鑑賞與歷史詮釋：陳寅恪批評觀念探析〉，《國文學報》第 62 期（2017 年 12 月）。DOI:10.6239/BOC.201712.08
- * 李貴生：〈陳寅恪典故考釋批評觀念及其實踐方法析論〉，《政大中文學報》第 31 期（2019 年 6 月）。DOI:10.30407/BDCL.201906_(31).0009
- 銖 庵：〈扁舟憶往〉，《旅行》雜誌 8 卷 11 號（1934 年 11 月）。
- 邱怡瑄：《史識與詩心：近現代舊體詩「詩史」的觀念遞變與戰爭書寫（1840-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鄭毓瑜先生指導。DOI:10.6342/NTU201804050
- 金章和：〈外祖父瞿兌之的人生軌跡〉，《人物》2012 年 4 期。
- 胡曉明：〈陳寶琛王國維吳宓陳寅恪之心靈詩學〉，《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2 卷 5 期（2014 年 9 月）。
- 桑 兵：《交流與對抗：近代中日關係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5 年。
- 張 軍（筆名乾岑）：〈瞿兌之《補書堂詩錄》版本經眼備考〉，網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bf4520102xwtw.html，檢索日期：

2019 年 11 月 25 日。

- * 張 暉：《中國「詩史」傳統》，北京：三聯書店，2016 年修訂版。
- 陳尚君：《唐詩求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
- 陳煒舜：〈長教葵麥泣春風——試論瞿兌之《燕都覽古詩話》題詩之時空想象〉，《新文學評論》2018 年 4 期。
- 陳熙遠：〈共和國裡的皇室婚禮——宣統大婚與帝制王朝的最後掙扎〉，《近代史集刊》94 期（2016 年 12 月）。
- 陳聲聰：《兼于閣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 陸 灝：《不愧三餐》，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 年。
- 黃玉釗主編：《梅州人物傳》，廣東：廣東省梅州志地方辦公室，1989 年。
- * 楊天宏：〈「清室優待條件」的法律性質與違約責任——基於北京政變後攝政內閣逼宮改約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 * 劉威志：〈清遺民的理屈與詞窮：論朱祖謀〈鷓鴣天廣元裕之宮體八首〉〉，蔣寅、張伯偉主編：《中國詩學》第 23 期（2017 年 10 月）。
- 鄧小軍：〈中國詩歌解釋史上的學術革命典範——湯漢注陶、《錢注杜詩》、《李白集校注》、《柳如是別傳》〉，安徽師範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編：《中國詩學研究》13 輯（2017 年 8 月）。
- 鄭毓瑜：《文本風景》，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增訂版。
- * 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年。
- 嚴志雄：《錢謙益的「詩史」理論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
- *（日）淺見洋二著，李貴、趙蕊蕊等譯，李貴校譯：《文本的密碼——社會語境中的宋代文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 年。

Yim, Lawrence C. H. (2009). *The poet-historian Qian Qiany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說明：書目前標示*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sami, Y. (2017). *Wenben de mima: Shehui yujing zhong de Songdai wenxue* [Textual codes: Song literature in social context] (G. Li & R.-R., et al. Tran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Chen, W.-Sh. (2018). Changjiao kuimai qi chunfeng: shi lun Qu Duizhi ‘Yandu langu shihua tishi’ zhong de shikong xiang xiang [Long letting the sunflowers and barleys cry in the spring breeze: On Qu Dui-zhi's time and space imagination of poems in *Yandu langu shihua*]. *Xinwenxue pinglun* [New literature review], 4, 154-168.
- Li, Ch.-H. (Ed.) (2016). *Zhongguo xushixue: Lishi xushi shiwen* [Chinese narrative research: Historical narrative poetry and writing].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ess.
- Li, K.-S. (2017). Wenxue jianshang yu lishi quanshi: Chen Yinke piping guannian tanxi [Literary appreciation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 analysis of Yin-ke Chen's ideas of criticism]. *Bulletin of Chines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TNU*, 62, 237-282.
- Li, K.-S. (2019). Chen Yinke diangu kaoshi piping guannian jiqi shijian fangfa xilun [An analysis of the critical ideas and practice of Yinke Chen's studies of allusion].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31, 341-388.
- Liu, W.-Ch. (2017). Qing yimin de liqu yu ciqiong: lun Zhu Zumou ‘Zhegutian guangYuan Yuzhi gongti ba shou’ [Qing-loyalists and their frustrated inarticulacy: A study of Zumou Zhu's “Zhegutian: simulating Yuan Haowen's Palace-style poetry”]. In Y. Jiang and B.-W. Zhang (Eds.), *Zhongguo shixue*, Vol. 23 [Chinese poetics, Vol. 23] (pp.197-232). Beijing: Renmin wenxue Press.
- Tian, J. (2012). *Qu Xuanying nianpu* [An chronology of Qu Xuanyi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Yan, Ch.-X. (2012). *Qian Qianyi bing ta xiao han za yong lun shi* [A study of Qian Qianyi's “Forty-six miscellaneous poems to dispel cold on my

sickbed”]. Taipei: Lian jing.

- Yang, T.-H. (2015). “Qingshi youdai tiaojian” de falü xingzhi yu weiyue zeren □ jiyu Beijing zhengbian hou shezheng neige bigong gaiyue de fenxi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article of favorable treatment of the Great Qing”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ase of a breach: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Qing court’s change in the agreement forced by Regency Cabinet after the Beijing coup in 1924].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1, 37-57.
- Zhang, H. (2016). *Zhongguo "shi shi" chuan tong* [Poetry as history: A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Beijing: San lian shu dian.

附 錄

復旦大學館藏《補書堂詩錄》稿本鍾介民序

或曰：「韻語自今將絕跡矣。」斯言也，余敢明其不然。蓋吾國之韻語，伊古以來，通於國史，本乎人情。一代人事之變化離易，皆映發而寄託於此。苟蔑棄史學，置既往之迹於不顧則已。不然，則詩人之苦心，必終有昭白於世之一日。舊詩學自道光⁸⁹間起一大變化，大抵託體古人之一節，以詠歎時事、發揚胸臆，甚且脫去習見之面目，不憚為庸俗所驚。就中如先外祖黃公度先生之《人境廬詩》，持論者尤喜稱焉。蓋道光⁹⁰以後，世變弔詭，非古人所能夢見。是以詩境亦從而恢廓。若政革以還，至於今日，則治術彌新，學術彌廣，人生遭際，悲愉苦樂，抑又非勝朝諸賢所及。如則所以寓之詩者，宜更非昔人之成就所能限。然者宿傾逝將盡，而繼起者尚未之聞也。以余所知，則長沙瞿君兌之，殆其人焉。

君生於甲午，凡近世駭目怵心諸大事，皆身所經歷，又隨侍⁹¹先德，備聞朝野人物、典章故實。自其髫髻，已以好學能文驚其老宿，得之於師友淵源者獨多。凡道光以來，文章政事頗萃於衡湘之間。君既被其緒餘，又親受學於湘綺、葵園兩大師，根柢深厚，固非流輩所敢望。民國初載，復嗣力於西方文學，通其肯綮。遂遨遊貴士之間，學有所籍，年雖所如，不偶輒復棄去。當世賢豪，固莫不重其文學聲名。論其身世，誠其有甚深之蘊藉，不媿以詩鳴者。至其詩之獨到處，足以上掩古人，下俟來哲。不可不翹舉數事，以諗知者。竊以為亭林標舉言必有物之義，自是衡量文字一大關鍵。君詩以一身之心情遊處為經，以當時之聞見為緯，讀一編，竟不如讀其日記年譜自傳，亦且不啻讀數十年間之史，而令人感慨於不自知。其間紀載時事，雖不明言，而語必有徵，

⁸⁹ 眉批硃筆在「道光」之「光」字右直紅線，天頭批「咸」字。

⁹⁰ 眉批墨筆天頭云「原作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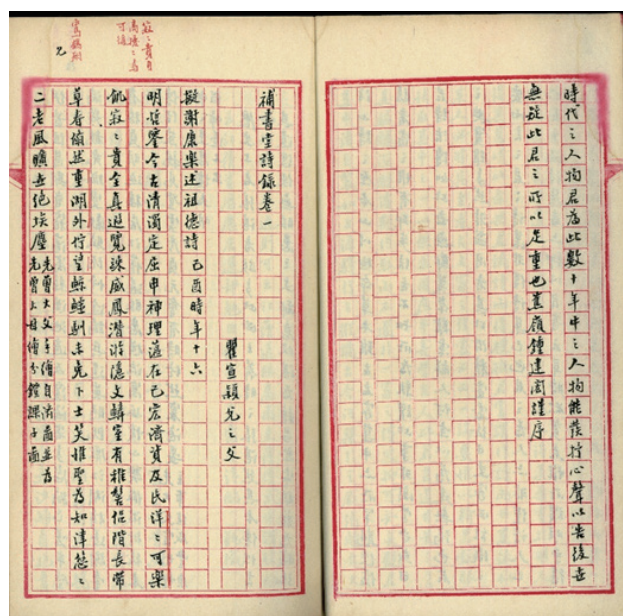
⁹¹ 天頭墨筆批「野朝」。

足供史料，其必傳者一。《詩》以敦厚為教，《春秋》有微婉之義。嬉笑怒罵，為宋以後文人弊習，君一本於忠厚，既不涉於標榜，亦無意於臧否，慎於論事而寬⁹²於繩人，尤不失史家謹嚴之意，其必傳者二。琬裁月露，本非元音，山水老莊，久成濫調，君詩驅遣萬家，悉赴腕底。其中經術有史裁，旁及海西學說，無一不可入詩，而又不以僻澀詭譎傷雅正，其必傳者三。

姑以近代詩派，勉相擬附，則余又有數說：蓋君詩善寫真性情似錢擇石，長於史識似凌次仲，能以散文之韻味入詩似姚姬傳、梅伯言諸人。而於近人所標舉之西江派，則殊不相近。此所謂特立獨行，不肯傍人門戶者。考其所以有此造詣，蓋於鮑、謝得其茂整，於庾得其精切，於少陵、玉溪得其波瀾，於韓得其俊偉，於白得其妥帖，於永叔得其淺易，於荊公得其深嚴，於放翁得其瀏亮，於遺山、灤陽得其疎秀，於元人得其華重，於明人得其雋峭，此余與君論詩而得梗概。君嘗謂作詩而曰某派似某人，必非其至者。古名家之佳處不止一端，要惟以精思銳眼，抉取其中之一以供我用，庶乎善學古人。此君之自道甘苦之言，其醞釀深醇、博觀約取，而不囿於一家之傳授，抑可知矣。觀君集中諸巨製，如〈上源驛行〉之綜論古今，〈河梁引〉之感傷離合。〈大防山詩〉之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雖古名家集中，亦所罕觀。使儉腹者當之，惟有却步結舌，不知所為。孰謂此事非關學乎？或曰：「君詩浩博如此，世無鄭《箋》，奈難索解人何？」余以為是無傷也。君之典實雖多，然非濫用者，其比附精當處，後日史家必能識之。要而言之，君之詩集，非僅詩集已也，君之為人，亦非僅詩人已也。其手稿詩集，亦聊已自寄云爾。將欲贊君，惟所謂「明乎得失，達於世變而懷其舊俗」⁹³數語差為近之。大凡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人物，君為此數十年之人物，能發抒心聲以告後世，無疑此君之所以足重也。蕉嶺鍾建閔謹序。

⁹² 眉批硃筆在「寬」之「寬」字右直紅線，天頭批「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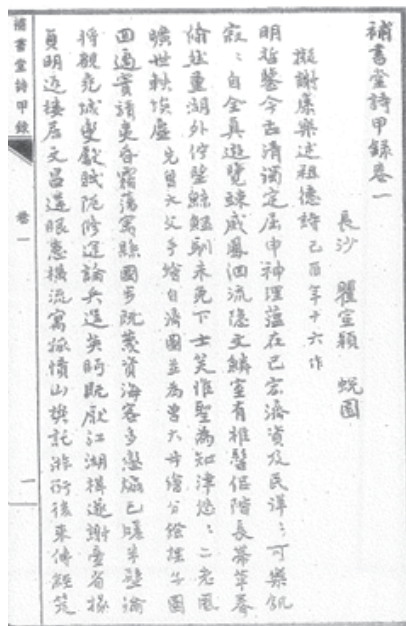
⁹³ 「舊俗」旁有硃筆補一直線。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補書堂詩錄》稿本書影



左：復旦藏《補書堂詩錄》稿本



右：香港油印本《補書堂詩錄》卷首

